

八一荣光 致敬军人

★★★ 八一建军节 ★★★

2025.8.1

1927 2025



福州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编辑委员会

主任：童桂荣

常务副主任：王 斌

副主任：纪浩鹏

编委：李永杰 刘兴旺 魏少辉 丁 飞

吴碧英 张曙婷 林淑周 欧 敏

赵咏梅 钟 诚 曹敏华

主 编：王 斌

副主编：林淑周

编 辑：丁春华 兰丰丰 陈琴容 郑梅钦 魏璐珂

福州党校学报

双月刊

2025年第4期(总第215期)

· 目次 ·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107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1204/C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25年8月20日

国内定价:

10.00元

印刷单位:

福建东印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新时代新思想研究

5 “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出场与辨析

康琪 周建文

15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引领
与认同赋能

甘子成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2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多维论析

赵昌旭

28 试论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思想

曹敏华

36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话语的情感意蕴

高博文

党的建设研究

4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的现实动因、目标指向与推进
路径

徐功献 曹静

版 权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维普、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52 以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三重逻辑

赖龙波

58 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厦门市商会为例

程曼晴

文化研究

67 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创新

李 宁 潘江滨

73 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现实根基、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杨顿媛

治理研究

81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

陈盛兰

87 青年生育观转型背景下“放开生育数量”人口政策之提倡

杨 帆 吴筱岑

编辑出版:

《福州党校学报》

编辑部

主 编:王 斌

副主编:林淑周

地 址:

福建省福州市

福马路 990 号

邮 编:

350014

电 话:

0591-88199355

电子邮箱:

fzdxxb@163.com

网 址:

<http://fzswdx.gov.cn>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The Main Contents

NO.4, 2025

General NO.215

05 The Appearance and Discrimin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ang qi, Zhou Jianwen

15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reate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Value Guidance and Identity Empowerment of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Gan Zicheng

22 Multi -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o Changxu

28 On the Mobilisation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Cao Minhua

36 Emotional Connotations of Mao Zedong's "People's War" Discour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eriod Gao Bowen

44 The Realistic Motivations, Target Orientations and Promotion Paths for Building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Good Learner in the New Era Xu Gongxian, Cao jing

52 The Triple Logic of Promoting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with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Lai Longbo

58 How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Party Building about Chamber of Commer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 Taking Xiamen Chambers of Commerce as an Example Cheng Manqing

67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Path Innovatio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Li Ning, Pan Jiangbin

73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Em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Realistic Foundation, Logical Approach and Practical Path Yang Diyuan

81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en Shenglan

87 Advocacy of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Lifting the Birth Limi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Youth Fertility Concepts Yang Fan, Wu Xiaocen

“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 概念的出场与辨析

康琪¹ 周建文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概念对比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从概念层面出发, 探讨“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两个相似却又不同的概念, 对于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从历史维度考察, 二者均为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谋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 对源自外部的“现代化”概念进行本土化重构与创新性阐释的产物。“中国现代化”首先作为地域性概念, 指中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及其结果, 它包括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作的全部历史选择。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指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结果。为避免对两个概念的误用混用, 有必要理清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起点、领导力量、社会性质上的差异性, 在未来走向和发展动力上的相通性, 对二者的概念范围进行界定。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概念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05-10

在党的二十大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入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重大成果。其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现代化实践提炼出的原创性概念。从概念对比的视角去理清“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概念的相通性与差异性, 对于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 中国式现代化是学界研究热点之一, 学

术界围绕着现代化问题从不同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我们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理论基础。在现有研究成果中, “中国现代化”(或“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是较常见的两个概念。仅从字面看, 两者仅一字之差, 那么这两个概念是否相同呢? 郎友兴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也“不同于‘中国现代化’”^[1]。赵锦英认为, “‘中国现代化’经过一系列的转变、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研究项目“‘三个更好相适应’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研究”(2025-KYY-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康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学。

提升和优化才提升至‘中国式现代化’的水平和高度”^[2]。张丽则直接指出：“‘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3]由此可见，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不能对两者简单地画等号。然而，自“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以来，学术界在涉及“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制约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发展和传播。

一是关于“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官方和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已经形成理论共识和实践认同，但是关于“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定义仍然众说纷纭。主要说法如下：赵锦英将“囿于现代化的一般模式、受外部冲击而在中国奋起实施的现代化称为‘中国现代化’”^[2]。王梦冰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界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从广义上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对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客观描述，侧重于在中国。从狭义上说，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现代化探索实践。”^[4]王学凯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 China）是一个目标，始于1840年后无数仁人志士探索国家现代化的追求”^[5]。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如何定义“中国现代化”这一问题尚存争论，亟待厘清。

二是“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混用误用问题。既然“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两者是不同的概念，那就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使用。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存在一定误读，甚至存在将二者混淆的现象”^[3]。延伸到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既有研究成果中广泛存在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念混用误用的情况”^[6]。这一情况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概念定义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别和联系认识模糊的反映。

因此，正确认识这两个概念，理清它们之间的相通性与差异性非常必要。那么，界定、区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两个相似的概念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出场

概念的出场指的是某一概念在思想史中的首次提出。通过分析概念的出场，可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把握其本质意蕴。需要指出的是，考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出场，离不开对“现代化”概念的研究，因为不论在“现代化”前面加上何种修饰词，实质还是“现代化”。

（一）“现代化”概念的历史缘起

同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一样，描述这一实践进程的“现代化”概念（modernization）也源自西方。“现代化”作为学术概念的正式形成可追溯至18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转型期，“现代化”概念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现代化”通常被人们用于描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众多积极事物，蕴含着“今胜于古”的“（现）时代化”意蕴。罗荣渠先生描述道：“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7]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角，系统地解析“现代化”概念的多维内涵及其内在逻辑：

其一，“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潮流，它指明了各国文明演进的基本方向，所有民族国家不论愿意与否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现代化。“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35-36}其二，“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核心和动力。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可以用“工业化”这个标题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以及进程。恩格斯就曾指出：“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9]由此可见，整个现代化进程是以工业化为原动力和驱动力，工业化奠定了自然变革和社会变革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基础。离开了工业化这个基础，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的价值理念以及人们关于现代社会的众多设想也就失去了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其三，“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变革过程。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核心，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等于工业化，工业化只是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还体现在政治、文化、思想等其他领域，基本内容包括市场化、民主化、世俗化等，指向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整体变化发展。其四，“现代化”在狭义上还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追赶发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正是现代化这层含义的体现。综上，“现代化”既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深刻变革，也包括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是一个表征世界上不同国家追求进步、发展变革、文明先进过程以及结果的综合性概念。

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的形成与语义的形塑，经过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对中国的殖民掠夺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东方

古老农业文明的碰撞中，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振兴中华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现代化。不过当时国人并未直接使用“现代化”的概念，而是用“中体西用”“西化”等话语来表征现代化。在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强调要以西学服务中学。在这里，“中体西用”“西学”实际上是“‘现代化’意涵的最初表达，在直接意义上即有从经济、文化和政治角度，反映出国人对中华民族崛起路径、方向和目标思考”^[11]。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体一用”思维推动下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落幕。随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之落后并非在“用”的层面，而在“体”的层面，必须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根基进行变革。随后，“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走上了历史舞台”^[12]，“西化”“欧化”等字样也在19世纪80~90年代出现在中国报刊上，这为“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有观点认为中国人首次对“现代化”概念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11]当年刘克述在其著作《新土耳其》中首次明确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并将其与“西方化”等同起来，内容包括工业化、科学和民主等资本主义化。^[13]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现代化”的概念。1921年6月，张太雷在分析中国农村妇女打短工的原因时就指出：“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粗放养蚕业受到现代化大工厂廉价生产的排挤。”^[14]1923年7月，陈独秀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指出：“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这些工人中政治觉悟开始发展”。^[15]在这里，“现代化大工厂”“现代化工人”是对工业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的具体描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较早地在经济领域使用“现代化”的概念。一个概念的形成、发展、成熟乃至传播需要一定的过程，然而，“现代化”概念在中国问世后，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报刊上，

并没有很快传播开来。

（二）“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出场

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就已经卷入了世界现代化潮流，“modernization”也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为“现代化”，“在中文语境中登台亮相”^[16]，这为“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出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明确提出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在1929年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自身困境，加剧了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地区的疯狂掠夺。加之受自然灾害以及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影响，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考验。这深深地刺激了国内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17]。随之，一些具有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先进知识分子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并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此的大讨论。1933年7月，《申报月刊》向全社会征稿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并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专辑。广大知识分子围绕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由此，带有鲜明地域性质的“中国现代化”概念得以正式提出，展现出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意识。此后，“现代化”概念逐渐取代“西化”“欧化”等概念进而风靡中国知识界，并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词群，完成了从抽象概念向具体话语的跨越。学界关于“现代化”内涵的认知也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化”，而是呈现出社会整体变革的综合性趋向，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和社会化均被纳入“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之中。

由于“中国现代化”一方面符合中国人民的语言表达习惯，另一方面又符合现代化研究以单个国家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论预设，截至今日我们仍然在使用。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

的。”^[18]目前，尽管不同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含义有着不同认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首先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是指中国迈上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结果，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结果。显然，这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的客观描述，侧重点在于中国。其次，“中国现代化”还是一个集合体范畴。既然“中国现代化”是指中国迈上现代化进程以及结果，那么中国所有历史阶段的现代化探索与实践都应该被囊括其中，既“包括学习和效仿他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包括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6]。由此可见，“中国人接受‘现代化’概念的过程就是把这一外来概念‘据为己有’的过程”^[19]。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已经开始思考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了。

（三）“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出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基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情况提出的原创性概念。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内涵和外延得到不断拓展。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中，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覆盖面拓展至“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新布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逐渐走向“全面现代化”之际，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概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又相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概念。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新高度。可以说，新时代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实践一往无前，“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也不断得到形塑。

如果说“中国现代化”是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及其结果，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突出“中国式”，指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结果。历史地看，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出场的历史语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历史语境变化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实际上是化用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这表明，两者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用“中国式的现代化”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指出：“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0]二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特别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21]在这些考虑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蕴含着与“他国式”现代化区别的意思，与现代化其他模式处于平行关系甚至是超越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表明西方现代化不是世界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各国的现代化存在普遍共性，也存在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的特殊性。基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凝练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22]。相较于“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覆盖面显得更为宽泛”^[23]，因而也更加适用于描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

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更为系统深入的阐释，除了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上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外，还格外突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4]。可以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性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必须看到，不论是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还是其本质要求，乃至重大原则都不可避免地刻上了两者的烙印。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还揭示了这些特色形成的渊源。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简单地以“中国式”对“现代化”作了定语修饰从而不同于“中国现代化”，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结果。

三、“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辨析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25]从“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显然发生了质变或者部分质变。为此，只有找到它的“边”，才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或者本质。此外，不应忽略的是，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演进不可避免地受一些相同历史条件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相通性。对“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概念分析既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也要把握两者之间的相通性。

（一）历史起点相异：鸦片战争与新中国成立
历史起点是指历史进程的开端，通常以某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为标志。由于其具有唯一性，因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中国现代化”的鲜明分界。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鸦片战争”。只有在鸦片战争以后，现代化才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呈现出特别突出和紧迫的意义。18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西欧一些国家借此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而此时的中国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却日益陷入社会停滞的状态。面对已经跨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显得十分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历经鸦片战争等侵略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割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国家主权遭受肆意践踏，百姓苦不堪言，在“‘西方’作为绝对主体而将‘非西方’视为有待征服、改造、优化、提升和完善的他者”^[26]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主体性失落的危机，国人逐渐意识到“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普遍的历史性命运”^[27]。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历史背景下，原有经济解体、政治失序，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被迫开启了。自此之后中国社会的所有重大变迁几乎都烙印着现代化探索的痕迹。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新中国成立”。自“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以来，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曾成为人们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的研究对象。从历史看，正是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从此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打破了受制于西方现代化的被动局面，获得了独立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现代化就不能发生。”^[28]新中国成立让中华民族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和建设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使得中国不再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自主地开启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4]这一重要论述为将“新中国成立”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提供了权威依据。

（二）领导者有别：各种政治力量的轮番上阵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领导者通常是指在特定组织、群体或者社会系统中，具备先进理念能够引领方向、凝聚共识、推动行动的核心领导人或领导集体。“中国式现代化”

的领导者与“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具有明显不同。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领导者。19世纪中叶，以洪秀全等为代表的领导力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这是农民阶级自发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探索中国独立和富强之路。19世纪60年代，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发起了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之路。1898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的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革时代的来临。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整整六十年，我国志士仁人，断头流血，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失败了，历史表明“旧民主主义已不适用于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29]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国现代化遭遇重大挫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了坚实的组织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逐渐步入正轨。可见，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曾当过“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

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唯一领导者。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对现代化道路不断进行探索和推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新中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设定了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坚实的战略支撑，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证、更坚实的物质基

础、更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跨越发展。

（三）根本性质差异：多次转变的性质与社会主义性质

现代化不是抽象的，必然具备一定的社会性质。在根本性质上，“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差异。

“中国现代化”由于领导力量的多样性，导致其性质由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转向。历史地看，太平天国运动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地封建化走向失败；洋务运动致力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最终难逃失败；戊戌变法虽然已经涉及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探索，但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仍然没有使得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辛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但是其胜利的果实却被军阀窃取。这些历史经验让一些仁人志士认识到：要想救中国、发展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敏锐觉察到：“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30]“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31]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要采取俄式方法，“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32]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提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宣布“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33]可见，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承担起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赋予中国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式现代化”从出场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现代化所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不相容的”^[34]。太平天国运动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时中国的满清政府企图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

生产力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也“注定要‘输在起跑线上’”。^[3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相较于封建生产关系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实践失败已经反复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领导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36]。自1956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质属性就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在领导核心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指导思想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新境界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制度保障层面，持续革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四）未来走向相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指出：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470-471}历史。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凭空而起，它以中国现代化所创造的条件为基础。“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差异性，也具有相通性。相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它们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前行方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现代化”就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回溯历史，在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强烈需求。在近代，中华民族因为落后于世界现代化进程而走向衰败，民族复兴必然需要在赶上乃至引领现代化潮流中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一致体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37]。但是，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尝试，却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要“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迈出的关键一步。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正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朝着“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方向前进。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宣言；党的二十大更加强调推进之“全面”，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号角。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9]由此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推动中国现代化不懈求索的伟大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奋斗的重要使命。

（五）发展动力同源：深远而强劲的内生逻辑

“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通性不仅表现在未来走向上，还表现在发展动力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与外因是解释事物发展动力的一对基本范畴。内因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作用，外因对事物发展变化提供外部条件。因此，探究“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动力，重点是研究内因，应该到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深处去寻找它们的动力机制。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自国家内部，而

不是外部。虽然中国现代化探索是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被迫开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西方。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在封建生产的桎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发展缓慢”^[40]，但是，如果不受到外敌入侵，中国将按照自身发展逻辑和发展进度走向现代化。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腥风血雨”，还一度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革命与反革命、变革与反变革的各种斗争中，中国人民艰难地进行着现代化的探索与尝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逐渐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源于内部，这种动力集中表现在中国人民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谋求独立发展空间所进行的反对西方列强殖民和侵略的伟大斗争之中，表现在这种抗争中所蕴含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之中。

同“中国现代化”一样，“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源自于中华民族所蕴藏的“深远而强劲的内生逻辑”^[41]。历史地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以及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人民精神上实现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拥有了破解各种现代化难题的思想力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广大中国人民不断奋斗，最终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39]。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通过对外掠夺、殖民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发挥人民的历史主体作用，对内依靠人民群众的勤劳奋斗和创新创业，对外则通过比较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体现出显著的内生型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就在于坚

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

结语

虽然“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都建立在“现代化”的概念基础之上，都出现在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道路、谋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指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和结果，进而以此区别于非中国的现代化。其次，“中国现代化”还是一个集合体范畴，指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作的全部历史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及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出来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侧重现代化的一般要求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又突出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避免将“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概念误用、混用的关键在于，既要看到两者的相通性，也要看到它们在历史起点、领导力量以及根本性质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区别。正确使用“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助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有助于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实践的指引作用，有助于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郎友兴. 作为修饰词的“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的要义和意涵[J]. 浙江社会科学, 2024(01):4-11.
- [2] 赵锦英. 从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J]. 教学与研究, 2023(04):18-28.
- [3] 张丽, 赵晓宇.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新思考[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01):64-70.
- [4] 王梦可.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N]. 长江日报, 2023-06-07(11).
- [5] 王学凯. 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概念对比的视角[J]. 东南学术, 2025(01):25-35.
- [6] 陈殿林, 秦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关概念辨析[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11):42-49.
- [7]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17.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5-36.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95.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82.
- [11] 侯竹青. “现代化”概念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7(03):83-88.
- [12] 李嘉莉.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从本土叙事转向世界话语[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04):40-46.
- [13] 刘克述. 新土耳其[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337.
- [14] 张太雷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21.
- [15] 陈独秀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435.
- [16] 刘洪森. 事件·话语·史观：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维度[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12):3-10.
- [17]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前言[J]. 申报月刊, 1933(07).
- [18]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23.
- [19] 李永杰, 陈世宇.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渊源考释与话语创新[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1-10.
-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3.
-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09.
- [2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400-401.
- [23] 朱前星. 论中国现代化基本内涵和价值导向的百年变迁[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06):20-25.
- [2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22.

- [25]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8.
- [26] 韩升,王朋朋.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自觉[J].新疆社会科学,2023(01):8-15.
- [27] 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J].学习与探索,2022(09):1-8.
- [28] 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1.
- [2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70-372.
- [30]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6.
- [31] 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4.
- [32]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 [3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
- [34] 黄一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次历史性跨越[J].党的文献,2022(06):25-36.
- [35] 余斌.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纵横,2023(01):25-31.
- [36]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01).
- [3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5.
- [3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百年大事记(1921—202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5.
- [3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 [40] 李侃,李时岳,李德征,等.中国近代史[M].第4版.北京:中华书局,1994:2.
- [41] 王广.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及其近代历史根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1):66-74.

责任编辑:丁春华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引领与认同赋能

甘子成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25)

摘要：党的文化领导权以“两个结合”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形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基础、精神基因、价值共识以及使命担当。同时，党的文化领导权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视野，赋能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驱动构建全球叙事体系、创新国际传播渠道、推动跨文化话语创新、完善效果评估机制，提升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非西方现代化道路提供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方法论，为全球文明秩序转型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文化领导权；价值引领；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G122;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15-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的突破，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下重构人类文明坐标的历史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是贯穿文明形态创新的重要引擎。一方面，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构建起植根文明基因、彰显真理力量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文明新形态

筑牢思想根基；另一方面，通过多维度驱动国际传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度。本文将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基因相融合的逻辑，从“理论耦合”到“价值引领”再到“认同赋能”的三重向度展开研究，深入探索党的文化领导权何以能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理论基础：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文明新形态的逻辑耦合性

“文明形态的本质与内涵，最终是由更基本、

基金项目：2024 年度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党建研究课题“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研究”（XKDJ202502）；2025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及广东实践研究”（GD25CX01）。

作者简介：甘子成，博士，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精神与力量所决定和铸就的。”^[2]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核心纽带，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以中华文明主体性建构激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层对话，依托全球文明协同实践凝聚人类共同价值，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系统性、开放性与引领性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与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联结

文化领导权发生作用的机制根植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的原理。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思想文化体系的中枢系统与价值基石，承担着国家精神共同体建构的观念基础与意义载体的核心功能。马克思主义以其革命性和科学性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5]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维度，其本质要求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铸就价值共识，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断将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出新的理论成果。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理论领域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效能主要依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建构力量之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表达。”^[6]在理论逻辑维度，人类文明新形态遵循历

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象化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文明实践范式；在实践逻辑维度，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革新现代化发展范式，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矛盾，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新理念。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文明新形态的精神纽带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立足自身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形成的核心精神标识，其本质在于确立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实现对共同体文化特质的自觉坚守与时代拓展。“文化主体性的要义在于拒绝成为他者的精神附庸，对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及其拓展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主张。”^[7]党对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与强化，始终以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根本指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消解，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担起“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使命，既坚决抵制全盘西化与文化虚无主义，又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形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在批判继承中重塑文化主权。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守正中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先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先进文化”“发展和谐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方针指引下，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8]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党的文化领导权所维护和发展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内生性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文明与相应的文化文明的综合体”^[9]，表现出传统文明基因到现代文明形态创造性转化的特色。在价值维度，中华文

化主体性通过“天下为公”“和合共生”等核心理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超越资本异化的伦理智慧；在方法论维度，依托“两个结合”的辩证思维框架创新文明发展范式，既规避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逻辑，又以多元文明平等互鉴提供中国方案。这种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内核的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历史必然，也是对人类现代化普遍困境的创造性回应，彰显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与时代使命。

（三）文明交流互鉴：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互动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人类普遍交往的结果必然“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404}，“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166}。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同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明交流互鉴。综观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善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党的文化领导权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政治保障。首先，党的文化领导权决定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其次，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收世界其他文明养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明的创新元素；最后，党的文化领导权全面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有效抵御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价值颠覆和“颜色革命”，筑牢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风险防范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0]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创造。”^[11]在党的文化领导权保障下，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国式现代

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世界民族构成呈现高度多样性，不可能存在单一的文明形态，文明交流互鉴以文明多样性和多元性为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本国国情，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创造文明新形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总体上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交流互鉴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丰富思想资源，包括希腊城邦民主蕴含的理性主义传统、欧洲启蒙运动倡导的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工业革命推动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等，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特征。此外，文明交流互鉴以共同价值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既为平衡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提供示范，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坐标系中，确立了物质精神共富、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演进新路标。

二、价值引领：党的文化领导权形塑文明新形态的特质

伴随全球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叙事正面临价值理性消解、文化认同危机与治理秩序失范的叠加影响。党以文化领导权作为战略支点，通过价值引领文明新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即是坚持以人民主体性的伦理坐标，激活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对话的精神密码，贯通核心价值从观念到行动的实践链条，重塑全球治理的正义性框架，使文明新形态更好地突破“传统—现代”“本土—全球”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生成兼具历史厚度、价值温度与时代向度的文明特质。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文明新形态的伦理基础

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要回答好“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是“一切为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立场形塑了文明新形态“人民性”的伦理基础。“人民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和活的灵魂。”^[12]

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资本至上”的逻辑，扬弃了资本主导下的人的异化，将人民主体性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全方位，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秉持“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利用人民的强大力量克服前进道路的一切困难，不断取得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成就；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遵循，将人民满意度作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的根本标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全民健康”到“教育公平”，每一项政策实践都致力于缩小差距、促进公平，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判标准，强调“人民不仅是文明的受益者，更是评判者”，通过民主协商、社会监督等制度设计，促进人民直接参与文明进程的监督与反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互动。

（二）深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文明新形态的精神赓续

党的文化领导权肩负维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实践淬炼，熔铸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党的文化领导权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提供精神养分。“文明的发展具有继承性、连续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只能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生成。”^[14]为构建高水平道德文明体系，需通过创新精神生活实践范式，激活“讲仁爱”伦理规范的现代转型；为加强高水平政治文明建设，需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重民本”价值理念转化为现代治理方式；为建设高水平社会文明，需通过加强诚信教育，健全诚信建设的长效

机制，实现“守诚信”道德规范的有效运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为建设高水平物质文明，需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崇正义”理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为建设高水平生态文明，需通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尚和合”思想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为世界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景，需通过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把“求大同”的社会理想转化为“大变局”下的全球担当，进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

（三）汲取核心价值观的精华：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先进性

“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本质上是价值观的争夺。”^[15]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是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系统中的主流地位，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遵循，为人民群众提供价值指引。核心价值观是不同文明形态相互区别的重要标识。西方现代化代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秉持普世价值。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进程中，普世价值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深入，其“导致人们仅注重物质享受却忽视精神追求，引发了价值迷失、信仰动摇和道德滑坡的问题”^[16]，同时在全球推广过程中导致国际社会严重失序。面对普世价值内在的矛盾，文明新形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民族国家到全人类的价值升华，形塑了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先进性，为全球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传统与现代融合，以中华民族“文明”“和谐”等伦理对接马克思主义人本理想，用“协和万邦”化解文明对抗逻辑，为人类价值注入兼容并蓄的辩证哲学根基；立足集体价值建构，将“爱国”“敬业”等集体主义精神嵌入人类价值认同，平衡个体与集体，超越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问题，重塑现代文明主体的责任伦理；立足发展伦理革新，以

“共同富裕”为实践目标、通过“平等”“公正”扬弃资本异化，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现代化核心坐标，推动人类文明从资本至上向以人为本的范式跃升。

（四）推动全球治理范式的创新：文明新形态的使命担当

当前全球治理困境源于西方“形而上学”思维主导的零和博弈与文明等级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西方文明中心论”，为了实现西方国家“权利优先”而奉行霸权性质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大与新兴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不断掀起‘逆全球化’浪潮，阻碍全球交流与合作。”^[17]党的文化领导力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既立足于民族主体性，又面向世界多元性，以辩证统一的哲学思维形塑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文明新形态以超越“文明中心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平等对话机制，推动多元文明互鉴，化解西方话语霸权，为全球治理注入兼容并蓄的文明基因，担当起人类包容性发展的使命；文明新形态以打破零和逻辑为条件，利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重构国际规则体系，推动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实现从“霸权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担当起人类共同发展的使命；文明新形态以探索命运共生的全球科学发展为方向，统筹国内减贫经验与国际发展援助，缩小全球发展鸿沟，以增强“以人为本”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担当起人类共享发展的使命；文明新形态以超越“文明冲突论”为重要特点，倡导合作安全观，通过政治协商与多边机制化解地缘矛盾，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和平实践，担当起人类和平发展的使命。

三、认同赋能：党的文化领导力驱动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18]。党的文化领导力不仅是国内文化治理的核心力量，更是推

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向世界的重要驱动力量。面对西方话语霸权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失衡，党的文化领导力通过构建全球叙事体系、拓展传播渠道、创新跨文化话语范式、完善效果评估机制，赋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传播格局，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与实践成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

（一）构建全球叙事体系：增强文明新形态的话语权

“全球人类正是在叙事过程中实现经验共享与情感共鸣”^[19]，全球叙事体系是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认知框架与意义载体。党的文化领导力立足中国实践与全球关切的结合点，赋能“现代化道路创新”的本土经验转化为“全球发展倡议”的普遍价值，通过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正义的独特探索，增强文明新形态的全球话语权。在实践成就层面，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数字社会治理”等新时代的伟大成果，通过微观叙事呈现中国制度优势与发展效能，打破西方对现代化路径的单一想象。在叙事逻辑层面，构建层次分明的阐释框架。在历史维度，以“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与“民惟邦本”的治理伦理为基础，激活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交往传统，为多元文明对话提供包容性框架，助力破解全球治理中单边主义与文明冲突的结构性矛盾；在现实维度，通过“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制度创新，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探索；在未来维度，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人工智能”等议题，坚持世界包容性发展，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案。通过多维叙事，中国经验既能体现本土特色，又能对接普遍性发展需求，增强国际社会对文明新形态的认知与共鸣。

（二）创新国际传播渠道：拓展文明新形态的影响力

“世界传播格局‘西强我弱’的态势并未根本性改变，导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仍以他塑为主、自塑为辅。”^[20]在“他塑为主”的国际传播背景下，文化新形态的优势性可能会被国际传播所忽视，甚至可能会被国际传播歪曲事实，其国际认同将遇到重大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党的文化领导权赋能统筹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渠道，拓展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影响力。以强化主流媒体旗舰平台建设为中心，通过多模态叙事矩阵实现精准分众传播，重点围绕“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21]提升议题设置能力；以培育非政府传播主体网络为重要依托，推动高校智库、文艺院团与跨国企业形成民间话语联盟，依托品牌化人文交流项目增进文明对话深度；以深化多边合作机制创新为保障，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深入践行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系统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将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数字治理等方案转化为可借鉴的公共产品；以推进数字传播技术自主创新为动力，突破算法推荐与数据安全技术壁垒，构建自主可控的分布式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区块链赋能的数字内容确权体系，通过技术主权保障文化主权，推动国际传播体系从技术依附向自主创新转型。

（三）推动跨文化话语创新：提升文明新形态的认同度

“新型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要搭建起与国外民众相互沟通的桥梁与纽带。”^[22]跨文化话语创新是消解文明误读与价值隔阂的核心路径。党的文化领导权驱动跨文化话语创新，提升文明新形态的国际社会认同度。通过运用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的原则，对体现文明新形态的代表性和标志性话语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创新，使其既

保留本土文化的话语基因，又具备国际传播的语义通约性，形成兼具解释力与包容性的话语表达框架。通过构建基于共情逻辑的传播机制，强化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性议题的深度话语关联，将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转化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法参考和借鉴，实现将民族实践经验的话语表达提升为全球合作框架视野下的话语共建；同时，在跨文化话语中嵌入受众视角，吸收目标地区的话语表达逻辑，促进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话语的进一步契合。通过技术赋能革新话语表达形态，借助数字媒介的具象化特征，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符号，突破语言与文化边界；同时，通过多边对话机制，搭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等双向对话平台，促进“独白式输出”向“协商式生产”转型，形成开放包容的跨文化话语生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实现文明新形态从认知接纳到价值认同的话语创新成效。

（四）完善效果评估机制：优化文明新形态的传播效能

科学的效果评估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必要条件。党的文化领导权立足全球传播规律，驱动构建科学系统的评估体系，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机制。一方面，建立多层面的评估框架，整合传播效能的核心要素。在传播广度层面，要依托第三方机构监测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平台的覆盖规模及内容引用率；在传播深度层面，通过跨国问卷调查和语义分析，考察海外受众对“共同富裕”“全过程民主”等理念的认知度与认同度；在互动效能层面，要追踪国际舆论场中围绕中国方案的讨论热度及情感倾向，分析跨文化对话中的共鸣点与认知偏差。另一方面，建立动态反馈机制，要将评估结果与传播策略优化相结合。例如，针对西方对“民主人权”的误读，可通过案例实证与比较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面向发展中国家，侧重传播减贫经验与技术合作成果，强化实

践验证与经验共享。此外,要注重长期效果跟踪,结合历时性数据对比,分析文明新形态理念在国际议程设置、全球治理规则重构中的渐进影响力。需要注意的是,在评估过程需兼顾主体性与客观性,既要坚持中国立场,以是否有效传递文明内涵、促进价值理解为根本标准,也要尊重传播规律,将海外智库报告、精英群体态度、民间舆论反馈作为重要参照,实现自我叙事与他者关切的辩证统一。

结语

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脉络,既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筑牢价值根基,又以全球视野创新国际传播范式。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中,党的文化领导权持续强化理论阐释力、文化感召力与传播亲和力,使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普遍性方案。总而言之,党的文化领导权引领文明新形态超越“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国际认同度以及国际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努力推动了人类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愿景。

参考文献:

-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24.
- [2] 管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文化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旨归[J].学习与探索,2021(09):10-21+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2.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9.
- [6] 郭明飞,杨俊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话语超越与话语建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4):51-65.
- [7] 刘超.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J].思想教育研究,2024(06):24-30.
- [8]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9] 杨生平,潘玥斐.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视野下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J].求是学刊,2024(06):18-27+2.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8.
- [11] 孙代尧.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16-24.
- [12] 臧建业,周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性研究[J].重庆行政,2023(06):97-101.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 [14] 陈金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5-10+2+150.
- [15] 杨值珍.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J].江汉论坛,2024(09):48-55.
- [16] 张志恒.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价值遵循[J].福州党校学报,2023(01):5-10.
- [17] 卢静.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01):98-108.
- [18] 韩兵,寇清杰.全球视野下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认同的现实路径[J].理论研究,2024(06):30-37.
- [19] 李涵沁,周庆安.基于国家经验与身份认同的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建构研究[J].对外传播,2023(05):22-26.
- [20] 杨番.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发生逻辑、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J].文化软实力,2025(01):83-90.
- [21] 张贵洪.全球发展倡议赋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J].当代世界,2024(08):16-21.
- [22] 史安斌,朱泓宇.发展传播学视域下主流媒体跨文化话语体系理念升维与创新路径[J].电视研究,2023(05):20-24.

责任编辑:魏璐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日战争 重要论述的多维论析

赵昌旭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宏阔的大历史观和积极的和平发展观, 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认识更加深化、系统与完善。他深刻阐述了伟大抗战的惨烈史实、全面揭示了伟大抗战的胜利原因、准确把握了伟大抗战的历史贡献, 进而郑重阐明了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向世界展现出当代中国谋求未来的积极姿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系列深邃的理论观点, 传达了内涵丰富的人道主义主张, 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维护和平、正义与发展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 习近平; 抗日战争; 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42; E29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22-07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一名政治家、理论家的卓越思维, 特别是秉持对历史负责的自觉态度重视抗日战争研究与宣传工作, 先后多次在纪念抗战胜利以及相关活动的讲话中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出系统论述, 形成了科学完善的理论认识体系。他在深刻阐述伟大抗战的艰辛历程中回顾那段悲惨的历史记忆、揭示抗战胜利的历史原因、把握伟大抗战的时代贡献, 进而在风云莫测的世界场域下郑重阐明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向世界人民展现出当代中国积极开创未来篇章的姿态。因而,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启程之际, 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深邃思想, 有助于增进维护

和平、主动发展的民族自觉, 有助于十分珍视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光明前途, 有助于深切理解抗日战争作为民族复兴重大历史契机的现实价值。

一、深刻阐述伟大抗战的惨烈史实

抗日战争之所以冠以“伟大”的限定词, 是基于此次战争闻所未闻的艰难惨烈程度及特殊的历史地位而言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在历史上曾长期保持着友好交往。然而, 伴随近代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过程中, 日本统治集团在其“大陆政策”的步步驱使下, 大肆武装侵略、殖民压迫近代中国, 给中国军民造成世所罕见的沉痛灾难, 造成无法估量的历史损失。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的基本形态与建构路径研究”(24CKS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昌旭,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党的建设。

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战争”^[1]。

近代以来日本反动统治者持续施行对华侵略行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代伴随西方殖民入侵以及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列强殖民入侵的对象。“特别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2]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政府借口台湾居民杀害琉球王国居民一事而侵犯台湾。“这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首次用兵，也是日本第一次对外用兵。”^[3]而后，“日本军国主义通过甲午战争并吞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等领土后，又通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和京津一带等地区驻军的侵略权益”持续扩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步伐。“1931 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1937 年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2]，这一侵华战争更是持续了长达十四年之久。“近代中国所受的创痛，纵不能谓均系来自日本，而实以日本给予者为最多最巨。”“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中国绝无负于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4]。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1]，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军民造成的死伤人数、财产损失等极为巨大，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文明破坏、给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等不可估量。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烧，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到蹂躏，大好河山遭到践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多达 3500 万人……造成的破坏及其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大肆掠夺，按照 1937 年的比价，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

亿美元。”^[2]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大肆使用各种极为残暴的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与迫害。“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2]，这不仅公然违反国际公法，而且放眼整个世界战争史都是极为罕见的，这给中国军民造成了极大的身体与心灵创伤。此外，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无视国际法，在制造血腥屠杀暴行的同时，大肆破坏和销毁中国文化宝贵遗产，企图中断中华文明历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机构、设施的破坏，对中华古籍、遗迹的摧残，对中国教育的干涉、侵扰，给中国文化事业造成了亘古未有的灾难。

纵使现有文献资料已足以证实日本侵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但随着抗战史料的进一步揭秘、挖掘与阐发，相信会产生出更多第一手材料来全方位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那段残暴历史。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抗战研究提出全新要求：“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5]进而获取、保存更多的真实性历史记忆，向历史作出最真实客观的交代。

二、全面揭示伟大抗战的胜利原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光明与黑暗的比拼中成就的，抗战胜利果实来之不易，有赖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及伟大抗战精神的弘扬，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依托于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合力，同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以及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为中国抗战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支持也为中国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后盾力量。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2]抗日战争的

爆发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得到高度弘扬与彰显。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6]，而这一觉悟与团结的核心动力即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7]337}必然成为支撑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定性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既是对伟大抗日战争所提炼的精神性因素的总概括，同时也充分证明着“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1]的强大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2]“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呈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乱象，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1]近代中国之所以政局动荡、各自为政，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民未能确立起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义无反顾地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责任。“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

柱。”^[1]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我们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8]521}毛泽东同志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充分展现出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对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

“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2]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8]354}这一基本认识，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同时积极主动地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开展全民族抗战作出卓越努力。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9]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对全民族抗战的认识时指出，抗日战争中“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10]。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始终广泛开展动员人民、组织人民的工作，提出和实施持久作战总方略以及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抗战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展，正是国共两大政党的通力合作、相互扶持，正是国共两党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正是国共两党在民族大敌、生死存亡之际的摒弃前嫌、一致对外，使得中国抗战力量迅速形成前所未有的民族合力，得以加速推进抗战胜利的步伐！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及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的人道主义援助为中国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支持。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伟大的中国抗

战也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等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与援助。

“苏联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物资支持，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直接投身中国抗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等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等等。更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记者群体，他们来华采访、记录、拍摄最真实的抗战场面并第一时间在国际上宣传报道中国战场的悲惨战况与伟大壮举，让世界更直观更真实地感受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突出贡献。

三、准确把握伟大抗战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保住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空间，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大前景，捍卫了人类和平发展的伟大事业，在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伟大的抗日战争洗刷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敌入侵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失败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1]近代以来的旧中国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挨打、失败以及签订数量庞大的屈辱条约等，更甚者一度被冠以“东亚病夫”“黄种人”“支那”等蔑称不仅使国际地位尽失，而且沉重打击着中国人民的自尊心，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中国的阴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

国社会各阶层纷纷投身于伟大抗战中，“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10]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不断攀升。

伟大的抗日战争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世界人民的高度尊敬与认可。自古以来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强国地位，直至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仍处于综合国力世界第一的位置，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屈辱史。然而，拥有数千年文明浸润的中国人民从不惧怕任何妖魔鬼怪、也从未屈服于任何外部势力，中国人民不怕邪、不怕压，在国家危难时刻向来敢于为独立自主而牺牲奉献自己，彰显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抗战的胜利即是由伟大的中国军民所书写的，是中国军民同心合力所汇聚起的伟大力量的展现。正是中国军民顽强地抗战才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身陷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他战线的作战。世界反法西斯盟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了中国在牵制日本侵略势力中的作用，如斯大林所言，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丘吉尔认为，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英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面出现的只有中国；罗斯福也认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正是基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中国有机会参与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开罗会议，有机会参与战后受降仪式以及出席东京审判，能够收复东北、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等地，才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因此，无论从中国为抗战付出的巨大牺牲来看，还是就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作用而言，中国的世界大国形

象已然重新确立。

伟大的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转折这一基本认识，在学界已成共识，抗战胜利至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盛况就是有力佐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一次次被中断、受阻塞，但中国人民未曾放弃、屈服，而是始终坚持抗争到底，战胜一次次的艰难险阻。抗日战争之所以被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是因为抗战给予中国一次历史性的社会重构、一次空前的民族觉醒、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一次教育警示国民的伟大时机，锻造出领导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12]

伟大的抗日战争有力地打击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力量，极大地消解了世界上的不和平因素，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最早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幕，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历经十四年之久，中日双方投入兵力高达四百余万人，战场遍及中国十八个省区，有力牵制着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地面部队和相当部分的海军与空军力量，有力限制着日本“南北并进”的战略实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计划，彻底结束了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历史，彻底瓦解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0]因此，中国抗战的胜利也有力证明了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潮流不可逆、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图景不可改、进步战胜反动的历史规律不可变，有力地捍卫了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

四、郑重阐明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从未有过对外殖民扩张的历史、从未有过对外野蛮侵略的行径、从未有过践踏颠覆他者文明的先例。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系列侵华战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彻底中断了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全民族陷入兵荒马乱的战争状态之中，和平的呼声在这一刻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心声。伟大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对和平与战争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信念与信心。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行径危害深重”^[13]，局部战争不断、冲突不停，“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12]，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新挑战。然而，“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12]，进而坚定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信念。伟大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切启示就是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14]，也是抗战历史所遗存下的重要启示。为此，当代中国的发展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相处，提出并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12]

伟大的抗日战争启示中国人民要坚定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民族尊严，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侵犯干扰。近代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苦难，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施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苦难极为沉重，曾一度使

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惨遭打击与伤害。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使中国人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更加体会到民族尊严十分珍贵，更加懂得坚守主权独立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向来崇尚正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的头破血流”^{[7]485}。经历过战争苦难磨砺过的中国人民对主权独立、安全发展以及民族尊严的重视程度超乎以往任何时期。当今中国，有底气有实力也有信心坚定捍卫住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启示世界各国人民要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争取和平、维护和平，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进步的一边。“历史是写在人民心中的，历史不容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10]今天，我们学习抗战历史、研究伟大抗战、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并非延续战争仇恨，而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集聚拥抱和平、谋求发展的新力量。世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奔涌不息，和平发展始终是历史主题，以往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丛林法则”早已被摒弃，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相交理念才是共存之道。当今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7]357}。世界各国人民已不再接受任何霸权行径，无论任何国家若以任何形式开展任何不正义的战争行为，终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也终将会以失败而告终。

结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以史为鉴，走好

未来的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警醒未来。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继承革命先烈的伟大遗志，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向前推进，书写当代中国发展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04 (02).
- [2]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04 (02).
- [3] 刘金田. 中国的抗日战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3.
- [4] 郭廷以. 近代中国的变局[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41.
- [5]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N]. 人民日报, 2015-08-01 (01).
- [6]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2.
- [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8]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5.
- [1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9-03 (03).
- [11]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40.
- [12]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9-03 (02).
- [1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 (02).
- [1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54.

责任编辑：魏璐珂

试论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思想

曹敏华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100)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战争动员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 为以后抗战动员思想的多方面展开奠定了历史基础。“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中央提出动员广大民众建立抗日组织, 实行下层统一战线, 进行抗日游击战等, 构成抗战动员思想的最初形态。全面抗战开始后, 中共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和文章中就抗战动员问题展开多方面系统的阐述, 加之相关文件的出台, 从而构建起完整的抗战动员思想体系, 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战争动员; 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65;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22-08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长期以来, 学界对战时中国共产党战争动员的相关课题作了不少研究, 但专论共产党抗战动员思想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拟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 考察中共战争动员思想的由来、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时期抗战动员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揭示其时代价值及历史贡献。

一、局部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的基本主张

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动员的认知与阐述, 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和反击国民党军队“围剿”。在早期论述战争动员时, 毛泽东业已作了“动员一切民众力量”去进行战争^[1], 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配合革命战争^[2]

等表述, 表明其已经把握总体战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 尤其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精神因素等多元关系之处理的理论阐述, 为以后抗战动员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奠定了历史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 一部分爱国军民开始了局部抗战, 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面对外敌入侵, 中国共产党毅然高擎抗日旗帜, 发出抗战动员的时代号召, 力主坚决抵抗。

(一) 加紧组织领导, 发动群众, 组建民众抗日武装队伍, 对日宣战

1931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 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3]548—549}。

作者简介: 曹敏华,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特聘教授、现任福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研究方向: 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就如何发动和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斗争提出工作方针,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与发展群众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3]567-569}

同年9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再次提出:“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4]次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前者宣布“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直接对日作战,“澈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5]637-638};后者提出:“要组织大批游击队从苏区各边境向外发展,在接近中心城市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统治的地方,可由游击队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实行游击行动。”^{[5]643}

(二) 首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政治动员,制定动员计划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使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必须团结全国各方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案,明确提出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倾向革命的学生、小商人、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3]560}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等在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中,提出在苏区实行政治动员,主要是开展对日作战宣传工作,在红军报刊上揭露日军暴行,编印各种小册子和画报,以激励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5]644},同时着手制定动员计划。

1933年初,中央苏区即将开始第四次反“围剿”,但为了抗日御侮,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化干

戈为玉帛,促使国民党当局在一定条件下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联手抵御外敌。为此,1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6]虽然发表这一宣言的本意是阐明苏维埃政权与工农红军是决心抗日的态度,旨在揭破国民党诬蔑“红军捣乱后方”的谎言,但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即明确表示“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较之先前倡导“下层统一战线”,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

(三) 号召实行全国总动员,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

随着局部抗战的推进,中共关于举全国之力共同抗日的思想得以确立。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提出:“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7]197}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公布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提出实行全民总动员的主张:(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采用多种办法解决抗日的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产生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视一切同情援助中国抗日斗争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为中华民族的朋友。^{[7]683-685}此六大纲领表达了全国同胞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和战斗精神,因而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和支持。1934年9月21日,《红色

中华》报刊载此文,签名者有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需要指出的是,该纲领是在中央红军即将开始长征前发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遭受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巨大压力下,仍对抗日救国念兹在兹的崇高风范。

1935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民众发表宣言,号召“动员中国所有民众,组织成为反日会、义勇队、没收日货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队,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8]210}。显然,此时中共高层提出的动员全国民众的组织形式愈加多样化,旨在团结更多的民众投身抗日洪流。

(四)呼吁停止内战,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道义感召、推动国民党当局转向抗日

外敌当前,形势严峻,以宽广的胸襟,捐弃前嫌,与国民党联手并肩走向抗日战场,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为鲜明宣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于10月1日发表在法国巴黎的《救国报》上。《宣言》指出:“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

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和组建抗日联军,表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8]265—267}《八一宣言》情真意切,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各方力量团结一致抗日,愿意化解恩怨,化敌为友的坦荡胸怀。

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下层与上层。这标志着中共已开始突破原先的下层统一战线之思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了新的方向(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在抗战动员方面,《决议》提出:“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8]536}

一年之后,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写作,对十年内战经验作了系统而深刻的总结,其中有不少重要观点深化了战争动员的认识。如政治动员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征兵须顾及人民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后勤保障要考虑时间性,等等,这些观点虽然是红军反“围剿”斗争的经验之谈,但对于全国抗战爆发后的抗战动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抗战动员思想的多方面发展

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标志,中国从局部抗战进入全国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和文章中,就抗战动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如何展开作了全面阐述,加之相关文件的出台,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动员的认识日益

深化，抗战动员思想多方面发展，并臻于成熟，从而构建起系统的抗战动员思想体系。

（一）抗战政治动员思想

政治动员，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进行战争而开展面向社会的思想发动、宣传教育等活动。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善于抓住要害，准确把握战时全国政治动员的突破口，进而提出推进抗战政治动员具体的思想主张。

1. “开放民众运动”、保障民主自由，为政治动员提供有利社会环境

早在1935年12月，中共方面就提出“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8]539}。“七七事变”前3个月，张闻天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大纲中更进一步提出：“我们工作的中心一环是扩大民主运动。”“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国内政治，召集国民会议，开放言论自由，开放民众运动。”^[9]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七七事变”的翌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国的通电中，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10]357}。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改革政治机构”。^{[11]127}7月25日，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12]同月26日，朱德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文章《实行对日抗战》，强调指出：“持久、艰苦的抗战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而“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为了使抗战能够有把握，应刻不容缓地废除对于人民的束缚，予以广泛的民主自由。”^[13]是年10月，董必武撰写了《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一文，从多角度论述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路径。指出：抗战

不能“只限于政府和军队的单纯抗战”，“我们要拥护政府进行政治上必要的改革”，“开放民众运动应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14]显然，中国共产党将保障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视为实行全国总动员的重要前提条件，为推进战时中国政治民主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强调在党政军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一切工作的重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动员在战争动员中的地位愈益突出，其对于激发国人爱国热情，鼓舞斗志，乃至进行“反动员”以瓦解敌军，均具有重要作用。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用了一段文字阐释政治动员问题。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他提出了深入进行政治动员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政治动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11]308-309}同年10月2日，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领导人致电聂荣臻等人时强调指出：“在党政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建立起持久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持久，准备艰苦奋斗，是一切工作的重心。”^{[11]369}十四年抗战历史证明，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乃是团结、组织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保证。

（二）武装力量动员思想

武装力量动员，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实施战争或应对其他军事危机，将武装力量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的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秉持“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理念，就武装力量动员问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对推动全国武装力量总动员，尤其是发展敌后根据地武装力量发挥了积极

作用。

1. 动员全国军队主力开赴前线，一部留守后方，合理使用兵力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11]12}鉴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人数有限，武器装备落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对于出兵前线问题十分慎重。同年8月1日，他们在给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的电报中，就红军作战原则提出具体意见，即：“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11]20}

全面抗战开始后，完整地提出抗战路线和基本纲领提上中共高层议事日程。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三份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在《十大纲领》中再次提出：“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此外，还提出：“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10]475-477}这些思想主张的精髓即为全民皆兵。

2. 顺乎民意，多组织、发展民兵，形成“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

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动员思想十分注重尊重人民意愿，如提出“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11]106}。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仍然

主张限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不可能实行征兵制，而以“经过自卫军，准备将来实行征兵制的过渡期”。^{[11]506}同年11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谭政等人在给华北和山东八路军各部的电报中指示：“扩兵工作应注意根据地之人力，多在边境及人口众多的区域进行扩兵。”^{[11]579}正是由于提出正确的武装力量动员思想，并切实贯彻落实，敌后根据地武装力量动员取得巨大成效。在全民皆兵武装力量动员思想的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继承红军传统，继续实行自愿从军制度。此外，在根据地内，不脱离生产的准军事组织——民兵、自卫队（军）作为军队的后备军，不断发展壮大，通过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梯级式之步骤，完成人民军队扩编任务。数量庞大的民兵与地方部队、正规主力军形成“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对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诠释人民战争的成功之道。

（三）抗战经济动员思想

经济动员，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进行战争，将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全部或部分由平时转入战时状态的活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物质条件和经济资源十分有限，因此经济动员只能在一定区域内实施。毛泽东告诉全党：“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11]754}基于此，中共领袖对如何进行战时经济动员进行了诸多思考，形成了抗战经济动员思想。

1. 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难关，重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8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动员报告时指出：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2]101}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就生产运动问题发表见解，提

出：“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15]

2. 注重财政经济工作的计划性和经济动员具体落实相结合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支持长期战争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工作是财政经济工作，各地应于电到一个月内，制定自己区域内本年全部财政经济计划。”强调：“农业是财政经济的最主要部门，春天已到，各地应立即颁布春耕运动指令，并动员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全体人员坚决执行之。”“一切在职人员，在不妨碍战斗，不妨碍工作，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均应参加生产运动。”^[16]¹¹⁶根据这些要求，战时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扭转了党政军民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

3. 吸引外来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办实业，奖励民营企业发展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16]⁷⁰⁴⁻⁷⁰⁵1942年12月，毛泽东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2]⁴¹⁹抗战时期，在党的抗战经济动员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中抗日根据地等经济工作稳步推进，既保障了军事后勤供给，又改善了军民的经济生活，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篇章。

（四）抗战文化动员思想

文化动员，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进行战争，在文化领域运用多种媒体，对军民开展文化宣传活

动。中国共产党认为开展抗战文化动员，对于占据舆论宣传阵地，同敌方开展舆论宣传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1. 全民抗战离不开文化动员和进行宣传战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文化的动员”。^[11]³⁰⁷194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指出：“在侵华战争中，日寇是十分重视宣传战的……因此，我们必须更广泛与更深刻地展开反敌伪的宣传战。”“我们的反敌伪宣传，是整个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是服务于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个总的政治目的，是和敌寇的灭华宣传针锋相对地对立着的。”^[17]

2. 善于运用多种宣传鼓动武器开展抗战文化动员

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宣传鼓动是思想意识方面的活动，举凡一切理论、政治、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因此，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党应当从各方面领导和组织文化运动，帮助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大后方、在敌占区、在根据地内都应当依照各种不同情况发展文化运动。”“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的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18]

3. 注重建构抗战文化动员运行体系，多元展现宣传鼓动魅力

文化动员是一个系统工程，打造全方位运行的工作体系，对于抗战动员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在上述这份文件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与范围、特点、基本原则，宣传与和鼓动的相互关系、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群众鼓动工作、文化运动，报刊、通讯社及出版工作、

宣传鼓动工作干部的培养、宣传鼓动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系统等十二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动员思想跃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此思想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广泛进行抗战文化宣传，使抗战文化动员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紧密结合，为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立下不朽功勋。

（五）抗战科技动员思想

科学技术动员，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适应战争需要，组织科技人员，从事科技开发研究的活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技术动员方面所提出的思想，亦颇有建树。

1. 重视自然科学技术作用，吸纳科技英才投身抗战事业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第一项中明确提出：“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19]66}此处所及“智力”，无疑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在内。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第十五条内容是：“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19]69}抗战时期，延安《解放日报》时常发表社论，论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阐述科技动员的相关主张。1941年6月10日，该报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材》，指出：“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上，技术科学，尤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不论是改良农牧，造林，修水利，开矿，工厂管理，商业合作，都必须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必须受科学的指导……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有着最广大的活动地盘。”^{[19]60}

为了汇集科技英才，使之在战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中国共产党颁布了许多优待技术人员的文件，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陕甘宁边区卫生处关于所属各类技术人员待遇规定的通知》，等等，合情合理给技术人员以适当的生活待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相应的待遇广招纳贤，激发广大科学技术专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2. 重视发展军事工业，着力推动武器弹药生产

全面抗战开始后，鉴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较落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展军事工业。1938年1月7日，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指出：“为提高军事技术，最后战胜日寇，必须集中各种专门人才，建立统一的国防工业……应迅速地适当地分布军事工厂于一些安全而便于制造和运输的地区。”“应用国内外专门技术人才，迅速建立制造或装置新式的军事器械。”^{[12]89-90}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赖于武器弹药的及时供给。为此，毛泽东提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20]167}1938年2月14日和15日，《新华日报》连载任弼时文章《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该文指出：“在巩固、培养、生息抗战军队与抗战力量当中，必须加紧军事工业的建立与扩大。”“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逐渐做到在持久抗战中军火之自给，而且能够供给军队以必需的新式武器。”^{[21]35}

武器装备的生产与自然科学技术密切相关。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科技动员集中体现在：一批科技专家将科学技术与根据地物质条件相结合，逐步解决化学、机械、冶金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在枪炮性能的改良、弹药生产工艺的改进和多用弹之研制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另外，注重军民融合，利用兵工厂的技术和机器设备，设计生产民用产品，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服务。还创办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培

养人才,提高农业技术,助力农业生产,开展医药科学研究,提高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水平,产生了多方面良好效益。

结语

战争动员因战而生,向战而行。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反“围剿”战争动员经验的基础上,准确研判中日两国国情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战争的特点,秉持正确的战争观、动员观、大局观和制胜观,回应抗日救亡的需求,在伟大的抗战事业中产生的全方位动员之思想主张,内容丰富,呈现出先进性、科学性、人民性、创新性、实践性等鲜明特征,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历史充分证明,中共抗战动员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战争动员理论,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40.
- [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
-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28.
-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
-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9] 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59.
- [1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3] 朱德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265、266.
- [14] 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思想资料辑录(上)[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6:18、19.
- [15]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4.
- [1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70—171.
- [18] 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07.
- [19]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
- [20]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167.
- [2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兰丰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 “人民战争”话语的情感意蕴

高博文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毛泽东“人民战争”话语既“说理”、也“陈情”，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与内在品质。毛泽东“人民战争”话语中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受苦难的痛心、对民族复兴的矢志追求，表达了他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信念、对战后中国建设蓝图的描绘，表达了他对国家前景的憧憬；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认知、对群众路线的实践探索，表达了他对人民力量的推崇；对党的领导能力的高度信任、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弘扬，表达了他的政党自信；对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认同、对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实践，表达了他对和平正义的追求。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话语；情感意蕴

中图分类号: A84;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36-08

话语不仅是理性的表达工具，更是情感的载体。毛泽东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面旗帜、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领袖，他的“人民战争”话语不仅“以理服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构建；更“以情动人”，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做到了“说理”与“陈情”的结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从情感维度探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话语的多层内涵，既能深化对“人民战争”话语的理解；更能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情感密钥；还能助力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构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

一、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之情——历史自觉的情感投射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不平等条约陆续签订，“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在反侵略的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以其高度的历史自觉构建了独特的“人民战争”话语。毛泽东“人民战争”话语中贯穿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之情。

(一) 毛泽东深切关注并深刻反思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

首先，毛泽东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与批判，表达了对近代民族命运的强烈痛心。他在《中国革

作者简介：高博文，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

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2]626}这一判断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更蕴含着他对国家主权丧失、民族尊严被践踏的愤慨和痛心。这种痛心并非抽象的情绪流露，而是植根于对中国近百年屈辱史的认知之中，并通过“人民战争”话语得以表达与传播，成为动员全民参与抗日战争的重要情感资源。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进一步强调：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任务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3]1053}。此类话语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更是对民族苦难的情感回应，也唤起了广大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共鸣与关切。

其次，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揭示了现实社会中人民群众所承受的具体苦难。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认清了各个阶级不同的政治态度，揭示了农民与工人在中国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在赴湖南考察后，他用“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4]的形象话语描述了部分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展现出其对底层群众疾苦的深切同情。这些话语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也通过情感的渗透力增强了群众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从而激发起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动力。

最后，毛泽东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对民族苦难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出生于湖南湘潭农村的他，从小目睹农民生活的艰辛，对劳动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青年时期，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广泛阅读中外书籍，接触新思想，形成了强烈的救国理想。他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在《沁园春·长沙》中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诗句。这些都体现出他早年便立下了改造中国之志。至抗日战争，毛泽东发出了“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的感慨，认为“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

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2]663}。这种从个体经验出发的痛心与担当，最终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民族责任感，并通过“人民战争”话语得以广泛传播。

毛泽东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的痛心不是孤立的情感反应，而是在历史认知、社会分析与个人经历三重维度上的统一。这种情感既是他构建“人民战争”话语的内在动力，也为后续民族复兴目标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通过话语的表达与传播，毛泽东成功地将个人的悲悯与愤怒转化为集体的觉醒与行动，使“人民战争”不仅是一种军事战略，更是一种情感动员机制，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二）毛泽东对民族复兴始终怀抱坚定信念

首先，毛泽东将民族复兴确立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历史任务，并通过话语构建起民族复兴的总体目标。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2]521}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政治与经济上的革命，更要实现文化上的革命。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5]。这一表述不仅是对革命目标的战略规划，更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宣示。他不仅强调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誓不投降”“誓不屈服”^[6]，更公开宣告：“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161}这类话语的广泛传播，使“民族复兴”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理想，而成为亿万民众共同奋斗的目标。

其次，毛泽东通过“人民战争”话语提出具体的复兴路径，使民族复兴的渴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他在《论持久战》中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并坚信中国将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不仅是一种军事判断，更是一种充满希望与信心的话语表达。他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反复使用“兵

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等口号，激发全民参与抗日战争的热情。这些话语既是对群众力量的肯定，也是对民族未来的深情展望，体现出毛泽东将民族复兴的宏大愿景与群众实践紧密结合的思想智慧。

最后，毛泽东重视通过报刊、歌曲、戏剧等多种形式进行文艺宣传，将民族复兴的渴望升华为一种具有高度感染力的情感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类话语频繁出现在大街小巷，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战斗意志。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展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意识最终演化为一种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历史担当。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不是空洞的幻想，而是植根于深厚的历史认知、现实分析与群众基础之上的一种战略构想。他通过“人民战争”话语将这种渴望具体化、情感化、大众化，使其成为激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日战争、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正是在这种话语与实践的互动中，民族复兴从一种情感诉求逐步走向现实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后来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表达的对民族复兴的深切渴望，不仅是一种基于历史苦难的情感反应，更是一种高度历史自觉的政治情感体现。通过对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深刻反思，他将个人的痛心升华为全民族的觉醒与行动号召。这种情感意蕴通过“人民战争”话语得以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既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动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种深厚的历史自觉与情感认同中，毛泽东成功地将个体悲悯转化为集体使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引领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核心力量。

二、对国家前景的憧憬之情——救亡图存的情感底色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篇首，毛泽东就提出了

“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2]481}。新中国话语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目标任务的话语表达，展现出对国家前景的憧憬之情。

（一）通过“人民战争”话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信念，激发人民的抗敌决心

首先，毛泽东从战略高度确立国家必胜的信心。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阐明了中国胜利的必然性。他通过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深入分析，提出战争将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中国最终走向胜利。这一判断既是基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信任，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高度信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1004}毛泽东所构建的“人民战争”话语不仅是对战争结果的预测，更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其次，毛泽东通过群众动员强化全民抗战的信心。他提出大量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如“团结就是力量”“坚持抗战到底”等，这些宣传口号不仅增强了民众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也传递出毛泽东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心。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人民群众才是战争的真正主体。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了新的政治主体，为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人民战争本身也塑造了党、军队与人民群众间的亲密关系。

最后，毛泽东实现了个人信仰与国家责任的深度融合。早年时，毛泽东便立下改造中国的志向。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革命理想与维护国家主权的使命紧密结合，他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

民主主义的中国”^{[3]807}。毛泽东不仅倡导国家主权完整的理念，更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复兴的理想。他亲自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确保各项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二) 提出新中国发展的初步构想，激励军民积极抗敌、共建美好家园

首先，毛泽东提出了未来中国的政治方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指出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未来的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治制度。这不仅是一种政治设想，更是一种对美好社会秩序的期待。

其次，毛泽东描绘了未来中国的社会愿景。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后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要实现真正的土地改革、教育普及和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任务是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经济上繁荣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国家”。^{[2]683} 这些话语蕴含着对战后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与繁荣的向往，也为后来的群众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最后，毛泽东构建的“人民战争”话语，成为了凝聚共识的思想工具。毛泽东善于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唤起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他用人民战争思想指导战争实践，要求八路军与新四军人人都要会打仗、会生产、会做群众工作，这样就能真正地“无敌于天下”^{[3]929}。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发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号召。毛泽东“人民战争”话语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将抽象的理想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目标，重塑了人民主体地位，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憧憬，体现了他对当时局势的深刻洞察，展现了高度

的政治智慧与动员能力。通过一系列富有感染力的“人民战争”话语，他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和国家未来的美好愿景传递给全国人民，为中国最终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并迈向新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对人民力量的推崇之情——群众路线的情感密码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人民战争”话语持续表达了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的根本的理念。他高度推崇人民力量，这种推崇不仅是战略层面的判断，更是政治立场与情感认同的统一。对人民力量的推崇之情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密码。

(一) 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有深刻认知

首先，毛泽东从理论高度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深情感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话语饱含对人民力量的推崇之情，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社会结构与革命规律的深刻总结。毛泽东通过批判历史上少数精英主导国家命运的传统观点，突出强调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种认识不仅具有理论深度，也体现出他对人民历史作用的坚定信仰。

其次，毛泽东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唤起群众的自我意识，通过话语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自觉。他在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口号，使群众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是国家的主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人民战争的主要口号之一，鲜明地表达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些话语饱含着对人民的深切尊重与信任。

最后，个人经历塑造对群众的情感认同。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早年多次深入农村调查，亲身体

验过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受到阻难时，他亲赴湖南进行农民运动考察，深切认识到农民生活之艰辛与农民运动之有效。在攻打大城市失利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革命道路。正是这种贴近群众的生活经验与革命实践，他能够真正理解人民的疾苦，也使他的群众观点具有深厚的情感根基。他不是站在高处俯视群众的领导者，而是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的同行者，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话语的情感内核。

（二）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与深化

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套具体的实践方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断探索如何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使之成为党领导人民战胜强敌的重要法宝。

首先，构建以群众为基础的军事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人民战争”的核心理念是战争必须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强调要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兵民一体”的作战模式。这种战略不仅体现了对群众力量的信任，也反映出毛泽东切实将群众路线作为克敌制胜的根本途径与重要法宝。

其次，推动群众参与政权建设与社会治理。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推行民主选举、减租减息、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政策，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权利。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必须与群众密切结合，时刻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利益而奋斗。事实上，人民战争在半殖民的中国创造了新的政治主体，这也是一个“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7]。这些政策的成功实践，使群众路线从理论化走向制度化。

最后，话语成为群众路线传播与落实的桥梁。毛泽东高度重视话语在群众路线实践中的作用。他通过大量的讲话、标语等将群众路线的核心精神转化为易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政治格言，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密切联系群众”等。这些话语不仅指导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也使群众路线深入人心，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对人民力量的推崇之情深植于他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深刻认知、对群众路线实践路径的不断探索之中。他通过“人民战争”话语将这种推崇具象化、大众化，成为激励中国人民投身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政治路线，也是连接着党与广大人民的情感纽带。正是与人民群众的这种深厚情感，让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凝聚人心、赢得胜利，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道路。

四、对政党的自信之情——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感释放

在抗日战争这一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不仅高度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对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毛泽东通过“人民战争”话语不断强化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使党成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精神旗帜。

（一）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的高度信任

首先，从历史经验出发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3]1098}他通过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等历史事件的总结，指出只有共产党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领导中国走向光明未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并通

过话语激发全党全军的战斗意志与胜利信心。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是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强敌、实现民族独立的关键所在。

其次，通过话语塑造党的坚强形象。毛泽东善于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强化党的形象。他用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等话语表达党的使命。他提出“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强调党员要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走在群众前列，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最后，个人经历强化对党的信仰认同。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成长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他在井冈山、延安等地的经历，使他深刻体会到党组织在极端困境中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使他对党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智慧充满信心。毛泽东突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认为民族兴亡的责任不仅在全国人民与抗日团体，更在于中国共产党。

（二）毛泽东大力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核

首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毛泽东不仅强调党的组织力量，也高度重视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毛泽东高度重视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构建了以英雄人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提到张思德、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的事迹，强调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忠诚、勇敢、牺牲精神。他在《为人民服务》中专门纪念张思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3]1004}这类话语不只是对英雄个人的缅怀，更是对英雄们共有的革命精神的颂扬。毛泽东通过“人民战争”话语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斗争意志，使革命英雄主义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重要精神资源。

其次，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力倡导“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愚公移山》

中以极富感染力的话语增强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3]1101}。他提出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英勇顽强”等口号，广泛应用于抗日根据地思想宣传、军队动员、群众教育等多个领域，极大地增强了军民的抗战决心。这些话语不仅具有现实激励作用，也为党在特殊历史时期塑造集体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毛泽东将革命英雄主义升华为党的文化基因。毛泽东不仅在战争中强调革命英雄主义，还将其纳入党的文化建设之中。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要求全体党员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有牺牲精神”，并将其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这种精神追求逐渐内化为党的文化特质，成为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在抗日战争后期，随着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对政党的自信之情，不仅体现在他对党的领导能力的高度信任，更体现在他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与传播之中。他通过“人民战争”话语不断强化党的核心地位，塑造党的光辉形象，并以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激发全党全军的战斗意志。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这种自信与激情交织的情感释放巩固了党的内部凝聚力，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五、对和平正义的追求之情——国际视野的情感投射

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毛泽东不仅关注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形势，也高度关切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他始终坚信，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也是世界和平进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人民战争”话语表达了对和平正义的坚定信念，并将中国革命置于国际主

义视野之中，展现出一种超越地域与民族的大局观和责任感。

（一）毛泽东对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有着高度认同

首先，毛泽东从战略高度阐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将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构建作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两大条件之一。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他明确指出此时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3]806}。他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2]475}，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必须融入全球斗争格局，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这种认识不仅体现了他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也反映出他对世界和平正义的深切期盼。

其次，通过话语传播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毛泽东善于用话语塑造中国抗日战争的道义形象，他在《论持久战》中将战争划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他反复强调“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自卫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2]476}。这类话语不仅增强了国内军民的战斗信心，也为赢得国际同情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种话语表达，使中国抗日战争获得了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最后，个人理想与世界和平愿景的融合。毛泽东早年便怀有远大的国际主义理想。他在青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关于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的书籍，形成了初步的世界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理想进一步升华，把中国革命视为推动世界和平与进步的重要力量，“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8]。这种情怀体现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斗争的精神动力。

（二）毛泽东对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与实践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不仅倡导世界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的理念，还积极践行国际主义精神，通过具体政策和行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和平正义的责任担当。

首先，倡导并落实国际主义原则。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都必须学习国际主义精神，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实践白求恩所践行的列宁主义路线。^{[2]659}他主张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不仅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在延安等地，他亲自接见了来自不同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记者，如白求恩、斯诺、史沫特莱等，体现出他对中国与世界命运相连的深刻理解。

其次，通过抗日根据地建设展示新型国际关系的雏形。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实行开放包容的政策，欢迎外国友人来华访问、报导和支援抗日战争。他鼓励中外交流，支持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国际友人参观抗日根据地的学校、医院、军队等，让他们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风貌。这些做法不仅提升了党的国际形象，也为中国未来参与国际事务积累了经验。

最后，话语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毛泽东高度重视话语在国际宣传中的作用。他通过大量的对外演讲、电报、信件等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抗日战争的故事。如“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抗战是世界和平的希望”“中国人民愿与各国人民一道反对法西斯主义”等话语，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这些话语不仅增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更多国际朋友的理解与支持。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表达的对和平正义的追求之情，不仅体现在他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认同，更体现在他对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与实践之中。他通过“人民战争”话语不断拓展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视野，将其置于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宏大叙事之中。正是在这种深厚的情感认同基础

上，中国共产党逐步树立起负责任、讲道义、重合作的国际形象，为中国日后走向世界舞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外交资源。

结语

“情感会渗透话语，亦会影响行为。”^[9]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构建的“人民战争”话语既“说理”又“陈情”，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情感面相。“人民战争”话语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更是一种深刻的情感表达。话语中蕴含的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对国家前景的憧憬、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弘扬以及对和平正义的追求，共同构成了一个以情感为纽带、以历史自觉为基础的思想体系。这种话语既回应了时代的苦难与危机，也塑造了集体的情感认同，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凝聚力量、引领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3.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5.
- [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12.
- [6]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433.
- [7] 汪晖, 罗岗, 梁展, 等. 20世纪中国革命与作为政治过程的“人民战争”[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87-98.
- [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414.
- [9] 安托尼·罗利, 法布里斯·达尔梅达. 当历史被情感裹挟[M]. 朱江月, 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229.

责任编辑：丁春华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的现实动因、目标指向与推进路径

徐功献 曹 静

(赣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 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自身的善学形象建设, 通过树立良好治学态度呈现了广泛学习和虚心用功的“善学”政党形象, 通过掌握学习的原则运筹、学习的时间运筹、学习的智谋运筹展示了“善学”政党形象, 通过积极提升治学本领塑造了“善学”政党形象。深入探究新时代党的善学形象建设的动因、内容及路径, 对科学把握该时期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建设等,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 善学形象

中图分类号: D25;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44-08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通过学习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树立了良好的治学态度、掌握了有效的治学运筹、提升了辩证式的治学本领, 加强了党的善学形象建设, 增进了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形象和威望,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 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 深入探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的现实动因、目标指向、实践路径等, 对于科学把握新时

代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 更好地建设好学、善学的无产阶级政党形象,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的现实动因

善学形象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善学形象建设, 是对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发展壮大的经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习基因的继承, 也是实现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的应有举措。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形象塑造研究”(MKS24201); 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好学善学形象建设研究”(YCXJ24-A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功献, 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党建;

曹 静, 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党建。

(一) 历史动因：中国共产党依靠学习发展壮大
的经验传承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2]百余年来，党始终重视自身形象建设，在善学形象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善学形象建设的丰富经验，为新时代党进一步建设善学形象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经验上的指导。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高度重视通过学习加强自身的善学形象建设。建党之初，党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革命任务，提出要“从思想上建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塑造党的学习形象，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及工农兵群众的学习教育，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军事技能、文化知识学习等在内的学习教育体系，初步塑造起党善于学习的形象。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党发展壮大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3]185}，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3]533}，开展了以整风运动为统领的学习运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学习团体，创办教导大队、红军学校等学习教育机构，进行开会集体讨论、定期演讲等学习活动，制定两小时学习制度、早晚点名说话等学习制度，推进了党内学习教育，为党的善学形象建设提供了重要平台。解放战争时期，党加大了对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力度，要求全党必须努力提高理论与政策和策略观点的学习，以适应新的革命形势，有力巩固了党善于学习的形象。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全国执政的政党地位，决定了加强自身善学形象建设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4]为此，党更为重视加强自身的善学形象建设。一方面，更加注重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外，还重视党治国理政所亟须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执政管理经验，并把对党员干部的优良传统、优良作

风及反腐倡廉等纳入学习教育的重要方面，并适时建立健全了党校与干校培训机制、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机制等，实现了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历史学习及向他国学习的学习方法。另一方面，该时期将党史学习教育纳入干部教育体系之中，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的通知》等制度，进一步将学习内容和形式规范化，提高了治学效率，有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善学形象建设。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为实现“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5]的党的建设目标，党中央特别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6]，要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学习普遍真理和学习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紧密围绕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极大增强了对党风、党性、党纪及党史经验的学习，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知识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并将这些学习贯穿于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全过程。同时，开设了党校、党政干部业余本科班等多种类型的学习培养机构，为党员干部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增强了学习的实际效果，使党的善学形象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 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继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学习理念与方法。中国共产党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学习基因，将其有机融入党的学风建设之中，为新时代党的善学形象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1. 博约相济治学原则的陶冶。古代“先博而厚约”的教育思想，强调广泛学习与深入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一方面，博约相济治学原则强调了学习

的重要性和持续性，主张个体应该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深耕细作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于执政党而言，这意味着政党成员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以更好地履行执政职责和服务人民。另一方面，博约相济治学原则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学习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中，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即“躬行而实践之”。这种治学方法论原则，塑造了中华民族博约相济、注重实践的善学传统，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提供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

2. 兼容并蓄治学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以厚德载物的胸怀学习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从董仲舒将儒家与道家学习方法的融合，到柳宗元主张对百家学说兼容并蓄，再到朱熹总结的“读书法六条”，古人学习均采用广取博收的态度，都强调以思辨的方法兼容并蓄地探究治学之道，以博采众长、贯通诸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多民族交流学习及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积极拥抱新思想新技术，倡导创新精神，鼓励探索未知领域，秉持着兼容并蓄的善学理念。这种治学观念，是中华民族学道、明道的珍贵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注入了观念上的文化滋养。

3. 知行合一治学方法的熏陶。这一观念源自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识与行动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等便是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7]。这既要求党员、干部在理论上有所提升，还需要他们在学习中勇于担当、敢于实践，将学习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指导实践和建

设好善学形象的力量。另外，学思结合、循序渐进等治学方法，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善学形象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现实原因：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应有举措

为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一定要强化活到老、学到老的思想，主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8][4]}。以推进“学习的革命”加强善学形象建设，是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应有举措，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1. 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现代化建设合力的需要。人民群众是推进现代化建设最深厚的力量。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形象建设的新挑战，党需要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作为形象建设的重要法宝。积极的、正面的政党形象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理念及执政能力的认可与好评，好学的、善学的政党学习形象则有利于提升党执政理念的可行性和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党善于学习的形象具有导向性和向心力，能够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勇于学习、乐于学习、善于学习，提升本领，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也能使人民群众紧紧地围绕在党周围，听党话、跟党走，勠力同心、迎难而上，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合力。

2.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9]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建设。在“两个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在善学形象塑造中强化党的政治领导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驾驭风险能力、狠抓落实能力及自我革命能力等多种能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党的执政理念的科学化、指导思想的创新性、奋斗目标的连贯性、队伍建设的规范性及执政

方式的有效性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的目标指向

“政党形象是政治组织的社会呈现,成为人们从外表认知政党的渠道。”^[10]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塑造了多样化的政党形象,其中“善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呈现出来的一种良好形象特质。

(一) 善学形象的前提:良好的治学态度

“治学态度,是一个人学习的看法和行动的综合体。”^[11]中国共产党的“善学”形象首先展现在党积极的学习态度上,在学习中砥砺修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广泛学习的政党形象。广泛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树立善学形象的基本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12]好读“有字之书”,善读“无字之书”,才能提升党的理论创新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与带领下,党员干部在善于学习上做到了三个力争:一是力争学习之广度。在学习内容上广泛涉猎,除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外,还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全面学习中华文明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等知识及做好本职工作所必需的各种新知识、新技能,并努力学习对改革实践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各种科学文化及管理知识。二是力争学习之深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同志们切忌走马观花式学习,要做到下马观花,坚决反对学习中的两种错误倾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致力于“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12]253}。三是力争学习之行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要“突出问题导向,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13]173},要用学到的知识指导实践,善于从名著中汲取灵感,从史书中

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的经验,做到知行合一。广泛学习的学风不仅大大促进了全党干部的理论武装水平的提升,树立了善学的政党形象,更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建设。

2. 虚心用功的政党形象。虚心用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学习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12]7}一方面,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到了学习对象多样化,做书本的学生,做实践经验的学生,做群众的学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号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师,学习他们的理论成果与立场方法来指导中国改革实践和发展中的问题;以人民群众为师,学习人民群众的基层实践经验与模范精神;以社会实践为师,从社会生产、改革发展和科学实验学习,指导实践活动,掌握新本领。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坚持用功的学习品质,并运用于党员干部的学习之中,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典型学习等多元化的学习方法,不断增强意志力和自制力,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和实践,塑造了一个虚心用功的善学政党形象。

(二) 善学形象的关键:有效的治学运筹

治学运筹既包含一般的学习方法,也包含其方法论的运用。新时代,党的“善学”形象展现了党在学习方法和技巧上的优势,能够把学到的知识有效地吸收、内化并应用,是党在现代化建设中大力倡导的一种优良品质。

1. 以学习的原则运筹树立善学形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树立善学形象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14]理论学

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的学习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制定科学的学习策略和学习计划，学习形象建设才会自然地同个体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大兴学习之风，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将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使得全党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运用，加强了党善学形象建设的效度。

2. 以学习的时间运筹夯实善学形象。新时代，党致力于掌握运用学习辩证法，在学习时间上做到分秒必争与劳逸结合，坚持做到“挤”和“钻”的时效管理式学习。在“挤”式学习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倍加珍惜在位的时间”^{[8]28}，要“及时跟进学”。日常生活中，习近平等党的主要领导身体力行，充分利用每一刻时间进行学习，无论是日理万机的工作时光，还是吃饭休息的闲暇时间，都是深化理论认识、提升自身修养的重要时段。在他们的带领和影响下，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深入学习各种治国理政所需的知识。在“钻”式学习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党员干部学习“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1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高效的学习效率，正是得益于其在辩证式学习时间上的运筹，大大夯实了其善学形象。

3. 以学习的智谋运筹深化善学形象。新时代，党坚持原有的学习传统，创新了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建设善学习型政党。一是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的学习制度。中央建立了以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为主的各种学习制度，为全党树立善学形象建设做出了表率。地方形成了以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为龙头的学习制度，并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富有成效的中心组学习研讨活动。基层组织

“建立了每周半天学习日制度、领导干部个人自学制度、专题辅导报告会制度、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联系点制度、学习档案制度、学习情况报送制度，学习检查评比制度、先进经验交流制度”^[16]等。这些学习制度的制定与完善，提升了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更好地推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与善学形象建设。二是设置了领导班子为统领的学习制度。建设好新时代党的善学形象，“关键中的关键，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认真学习。”^[1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到“学起来”主动学习，增强学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持做到“信起来”，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筑牢对党绝对忠诚；坚持做到“用起来”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坚持做到“带起来”，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员领导干部不仅成为善学的典范，还促进了整个党的学习风气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党员干部学习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对善学形象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善学形象的升华：辩证式的治学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18]建设党的善学形象，要将学习本领置于首要位置。新时代，党不仅有坚定不移的学习态度及灵活多变的学习方法，还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治学本领。

1. 坚持“苦读”与“善学”的辩证统一。“在知识爆炸的年代，要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又要有会学善学的能力，真正做到‘苦读’与‘善学’相统一。”^[19]苦读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坚持性，善学则是在学习中具备良好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学、挤时间学、下大功夫学，在苦学中坚定信念、在苦学中增强本领，在苦学中担当作为。然而，党员干部的学习并不是片面的一味强调苦学，而是在苦学的基础上根据工作要求牵引性学习、根据实际灵活性学习、根据问题针对性学习，将学习的原生动力与有效路径

二者辩证统一起来,坚持“苦读”的精神,提高“善学”的本领,做到“苦读”与“善学”的统一,形成良性循环,共同作用于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之中。

2. 坚持“学习”与“思考”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政者则要看重前半句,善学善思,善作善成,不断提高自己,充实自己。”^{[8]244}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知识的学习,为“学思结合”奠定基础。党员干部不仅善于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决议等知识,还广泛拓展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学习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及优秀文化成果等多方面内容,为其思考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党积极践行“学思结合”,对学习进行深化和升华。党在理论学习中思考践行初心使命的路径,在政治建设、具体民生等领域思考为民服务的举措,在学习政策法规中思考战略推进措施,在党建基本原理的学习中思考组织建设方法,并在思考中不断调整学习内容,优化学习方式,做到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统一,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积累,提升了学习本领,构建了良好的善学政党形象。

3.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党在善学形象建设中的重要品质。“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是学懂弄通理论、掌握思想真谛。”^[20]一方面,党通过全面且深入的理论学习引领实践方向。通过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全党上下筑牢了信仰之基、补足了精神之钙、把稳了思想之舵,明晰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担当与目标追求,从而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不断优化符合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党的实践经验又推动了理论升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实践探索,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

材。这些实践成果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使党的理论体系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完善。新时代,党通过扎实的理论学习为实践定向导航,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发展创新,成为党的建设善学形象的关键本领。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学形象建设的推进路径

继续弘扬党持之以恒、与时俱进的善学精神,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需要在理论促学、领袖示学、制度保学、交流拓学等方面持续发力。

(一) 理论促学:增强党善学形象建设的底色
党的内在特质决定党的形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9]。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3]68}因此,构建善学的政党形象需要强大的理论武装本领。

1. 要把提高理论素养作为增强善学本领的根本。党员干部要树立良好的学习态度,提高善学形象的定位,树立“挤式”“钉式”“韧式”的治学态度,挤时间学、下功夫学、坚持不懈学,在学习中提高理论素养、把握规律。要做到“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习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建设善学政党形象的决定性因素。

2. 要善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不仅要善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善于学习党的历史和国史、善于学习党规党章党纪、善于开展主题多样、形式丰富、常态化制度化的党内主题教育,并且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纪律教育、业务教育等,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的责任使命,提升政治素养。最后,要善于把握党的理论创新。党要面向时代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以及思想体系的创新,注重运

用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运用群众路线法、调查研究法等工作方法致力于打造一套具有中国底色的理论创新学习体系，指导和推进新时代党善学形象建设与发展。

（二）领导示学：绘就党善学形象建设的主色

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对增进党的善学形象建设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21]

1. 要做率先学习的垂范者。领导干部要进行持续学习，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主动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国外学习，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学、对着问题改，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引导学习方向的带头人，增添善学形象的感染力。

2. 要做搭建学习平台的工程师。领导干部要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和目标，确保学习活动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重要会议精神开展多样化的主题学习。还应当深入基层，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强化服务意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使善学形象具体化。

3. 要做服务学习的公仆。在增进善学形象政党建设中，领导干部要坚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信念，做人民群众学习的指引人。由此，领导干部可以引领全党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从而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绘就党善学形象建设的底色。这既符合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建设的要求，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需要。

（三）制度保学：提升党善学形象建设的成色

建立健全学习机制是推动党善学形象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两学一做”全党学习机制、党校教育学习机制、专题辅导报告会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建设了成效显著的学习体系，提升了党善学形象建设的成色。因此，全

面推进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善学政党形象，要建立更健全的学习机制。

1. 建立更健全的学习保障机制，形成党善学形象建设的内在动力。不仅要做好物质保障，学习活动需要诸如学习资料、学习场所、学习经费等物质投入，确保学习活动有序开展；还要做好组织保障，建立健全学习领导责任制度，继续发挥领导干部的善学示范作用，抓好领导班子的学习管理，形成以上率下的良好学习风气。

2. 建立健全学习约束奖励机制，彰显善学形象建设的成效。一方面，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检查督导、坚持旁听交流常态化督学、加强党员干部述学评学与组织干部考察时考学，确保中国共产党学习的成效；另一方面，要建立评估体系、干部考核与评优晋级结合、确定奖励周期等措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形成优良学风。

3. 完善学习成果转化机制，强化党善学形象建设的保障。掌握学以致用用的善学技巧，才能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建立健全调研成果学习转化机制、完善先进经验推广制度、规整学习评估反馈制度，建设好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善学”政党形象。

（四）交流拓学：打造党善学形象建设的亮色

党的对外形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名片。“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9]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对外学习是提升党执政能力和构建善学政党形象的重要途径，要坚持把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

1. 要建立更加健全成熟的对外学习机制，鼓励和支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形成内外兼修、博采众长的学习格局。

2. 继续学习国际最佳实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学习渠道以加强善学形象建设效能的创新能。要通过网络、多媒体等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加强国际形象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深入挖掘中国共

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塑造国际形象的文化基因，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进而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奠定体系基础。

3. 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守中国形象建设传播的真实性原则。要维护党在国际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更要在联通全球的现代化对外传播体系、充分利用信息媒体渠道基础上拓展学习阵地，揭示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背后的驱动力和成功秘诀，增强党善学形象建设的亮色。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9.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54.
-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1.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
-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3.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9.
- [8]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9]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24-07-19（01）.
- [10] 齐卫平. 中国共产党廉洁形象建设的思考[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5）：3-8.
- [11] 胡小林，于云才.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270.
- [12] 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4]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 求是，2023（10）：4-8.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311.
- [16] 何祥林等.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25.
- [17] 李崇富.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J]. 前线，2010（01）：27-30.
-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8.
- [19] 习近平. 善学善思善作善成[J]. 求是，2007（09）：27-28.
- [20] 人民日报理论部. 思想纵横[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319.
-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03.

责任编辑：兰丰丰

以伟大建党精神推进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三重逻辑

赖龙波

(福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 伟大建党精神是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动力, 以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从历史逻辑上看, 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产生和发展。从理论逻辑上看, 伟大建党精神是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引领、理论源泉。从实践逻辑上看, 伟大建党精神能够夯实统一战线工作, 其现实路径包括: 以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向、强化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使命担当、锤炼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坚强意志, 涵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为民情怀。

关键词: 伟大建党精神; 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52-0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党的二十大上, 他号召全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虽然是新时代概括的, 但是自建党伊始其内涵就一直引领和激励着党的各项事业。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 需要我们以伟大建党精神加以推进。伟大建党精神在思想引领、理论源泉、实践路径探索等方面为新时代新征程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指导。

一、历史逻辑: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伟大建党精神指引下产生与发展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历程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高度一致。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历程, 引领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是其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肇始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和实践。甚至在建党之前, 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人对建立统一战线就有思考了。1919年,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2024年度全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课题“以伟大建党精神推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探究”(FJSY2024011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赖龙波, 福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党史党建。

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指出：“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1]同年4月，他又在《每周评论》中强调“各劳工的联合”，并鼓励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联合来完成中国的变革。^[2]1919年7月至8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3]1920年，陈独秀等在上海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于11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强调共产党“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4]487}。这些思考和论述无疑闪烁着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为日后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很快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积极建立统一战线。1922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同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然性、可能性和发展前途进行了具体阐述，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认识，为后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一大召开，宣告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正式形成，这是党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员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本色维护统一战线，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质不遗余力地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所以迅速得以开启，正是因为有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

（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伟大建党精神推动下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生了新变化，党开始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

的民族统一战线”^[5]，即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党担当起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指出“联合起来……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4]536}。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全面抗战开始后正式形成，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党还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并在根据地广泛实施，团结了根据地各阶层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为实现民族完全的独立和人民最终的解放，党提出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党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汇集了磅礴力量，赢得了解放战争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心是争取和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统一战线相关制度在这期间得到了极大发展，多民族大团结局面形成，中华民族力量更加强大。虽然这期间统一战线工作有过失误和曲折，但是其经验教训也为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党需要汇聚各方力量解放生产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为“爱国统一战线”。同年，第十五次全国统战会议召开，阐明今后统一战线工作要逐步服务于“四化”建设。团结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与港澳台、海外同胞踊跃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是统一战线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的突出特点。

新时代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全力做好政党、阶层、民族、宗教、港澳台、海内外同胞等工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通过制定和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完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通过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对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持续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

纵观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历程,它一直适应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这一历程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程高度一致。这一历程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坚守理想、践行初心、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二、理论逻辑: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源泉、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生及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结合的精髓就体现在伟大建党精神中。百年来,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熔铸于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中,成为了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与力量源泉。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引领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作为一切实践的逻辑起点。正是在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坚持真理,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引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国情变化不断调整统战策略,尤其是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统一战线一直能发挥法宝作用。抗战时期,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抗战需求,部分拥护抗日的大地主阶级也被纳入统战对象。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新兴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人员等新阶层都成为新时代的统战对象。

坚守理想,就是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尽管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困难,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革命时期,许多地下党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无疑是共产主义信仰支撑着他们。当前统一战线工作也存在各种风险,有来自党外所谓“公知”的反党反国家行为,有极少数群体对党的领导缺乏认可度,也有少数民族领域存在的问题。只有坚定信仰直面这些问题,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才能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蓄力。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思想上一直引领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百年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百年来,党始终将统一战线工作与自身历史使命紧密结合。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动力源泉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正是伟大建党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激励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推进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前进。百年来,统一战线工作虽历经多次调整变化,但始终服务于同一个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团结、联合各方力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7]。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团结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力量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7]9}。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团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者“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7]15}。进入新时代后，统一战线工作的使命任务主要是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开，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大团结大联合凝聚人心和力量“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7]23}。

百年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正是因为践行了党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8]。新时代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精神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百年来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主基调。统一战线工作一路走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无不是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艰苦奋斗中得来的。在新疆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杜重远、为了民族复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的车耀先、“九一八事变”后在齐齐哈尔等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王复生都在英勇斗争中壮烈牺牲。百年来，党的统一战线都是历经无数艰难险阻促成的，都是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结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党多次展开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多次制造摩擦的情况下，党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以斗争求团结”，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无数党员尤其是大量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以不怕牺牲的精

神形成了“第二条战线”……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工作每当遇到困难，我们也总是能发扬斗争精神去战胜困难。

新时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国际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8]，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国内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任务艰巨；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需要与时俱进；防范和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等都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复杂的情况，尤其需要我们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全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打开统一战线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质将激励共产党人继续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向前发展。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本色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对党员政治立场的基本要求，也是党的宗旨、根本任务等方面的重要体现。“对党忠诚”关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方向，是保证其能否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关键。在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上，党之所以能成为各种力量的领导者，归根结底在于广大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在于他们坚持人民立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最大优势，而“对党忠诚”是发挥这一优势的重要保障。

“不负人民”是党的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持续百年，赢得广泛支持，靠的就是“不负人民”，始终以中华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政权顾及到各阶层的利益，符合民众期盼。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保障了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对国计民生的重

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促进经济整体发展、扩大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8]。所以，统一战线工作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这样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将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等最广泛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既能凝心聚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能让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真正实现不负人民的价值追求。

三、现实逻辑：以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现实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9]33}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仍然是党的重要工作的一部分，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8]为应对这些变化，需要发挥伟大建党精神的作用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一）以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所内含的诸如理想信念、初心使命、实践精神、人民情怀等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在党的历史上持续发挥法宝作用并延续至今，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核心，是其顺利发展的最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8]因此，新时代新阶段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发挥党的领导优势。

第一，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面对当前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第二，培养高素质的统战干部队伍。通过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和党性教育，引导统战干部全身心投入到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到不负人民。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同时还要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善于处理各种复杂敏感问题，切实发挥统一战线工作中党的领导的优势。第三，加强党外人士爱党爱国教育，增强他们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他们能够保持政治清醒，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二）以伟大建党精神强化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使命担当——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建党精神深刻体现了党百年来的奋斗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来，党的一切工作包括统一战线工作在内，都服务于这一主题。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核心要义，尤其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但昭示了党的奋斗主题，也昭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奋斗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9]33}。因此，必须强化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使命担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第一，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把统一战线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结合起来，最大限度汇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聚焦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积极促进政党、民族、宗教等关系的和谐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第三，要在实践中贯彻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强化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

（三）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坚强意志——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百年来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主基调，深刻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斗争精神的精髓要义。统一战线工作的推进过程，过去不是一帆风顺，未来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第一，明确斗争的方向和立场。只有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才能找准主要矛盾，从而战胜党在统一战线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方向和立场不对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进程中，一定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是斗争方向的根本保证。第二，要保持敢于斗争的勇气。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工作要坚持求同存异，还要敢于直面各种困难，保持定力，与各种困难作斗争，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8]。第三，还需注重斗争策略、增强斗争本领。注重斗争策略，就要把握统一战线的斗争规律，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增强斗争本领，就是要在统一战线理论学习中夯实斗争根基，在统一战线实践中提升斗争能力。

（四）以伟大建党精神涵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情怀——为人民服务

伟大建党精神深刻展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价值取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情怀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革命的党成为长期执政的党的关键因素，也是其能在统一战线中担任领导者，把各群体团结起来的关键。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为了人民，统一战线工作归根结底也是服务人民的工作。第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

始终牢记并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时刻注重关心关爱各群体的民生福祉。第二，要加强作风建设，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全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坚决纠正“四风”，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团结，真诚对待党外人士。第三，要坚持胸怀天下，从全局、整体、长远的视角看待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实现好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照顾好、实现好各方面的具体利益，使统一战线更深入人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更加巩固。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文集：上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08.
- [2]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2.
- [3] 毛泽东早期文稿 [M]. 长沙：湖南出版社，2008：345.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周恩来选集：上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7.
- [6]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6.
- [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8]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N]. 人民日报，2022-07-31（01）.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丁春华

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厦门市商会为例

程曼晴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福建 厦门 361027)

摘要: 与快速发展的民营经济相比, 商会党建总体上仍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 发展较为缓慢。以厦门为例, 商会党建工作注重组织覆盖, 但组织功能未能有效发挥; 注重强化政治引领, 但党建与会建融合不充分; 注重打造党建品牌, 但没有树立牢固的全局观念; 注重队伍素质提升, 但基础要素保障力度不够。新形势下, 面对加强党的建设有效途径、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新要求, 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领导协调各方资源, 发挥政治引领的制度优势, 创新组织发展的模式, 通过工作激励构建和谐商会, 利用绩效考评加强自身建设, 建立健全人才队伍培养机制, 夯实基础保障条件, 找准党建会建相融合的契合点。

关键词: 商会; 社会组织; 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F276.5;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58-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 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1]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 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2]。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 始终

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 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 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3] 这些论述为新形势下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力量。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 全面增强党对各类各级社会组织的领导, 就要高度关注社会组织发展变化的特点, 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 加强指导和管理。而行业协会商会在我国各类社会组织中发展最为充分, 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推进作用。

基金项目: 福建省厦门市工商联(总工会)2024年度调研课题项目; 福建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与决策咨询项目(2024XT016)。

作者简介: 程曼晴, 博士,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党建学、基层组织建设、非公党建。

一、新形势下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 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迫切需要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本质是党的执政基础问题。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会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社会精英，集聚了许多出色的民营经济人士，他们有较强的社会动员力和基层影响力。这些新崛起的社会力量，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党的工作与服务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特别是要注意防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社会组织的旗号干非法勾当。党建工作只有及时跟进，才能保持党的影响力、吸引力不变，社会组织与党的联系纽带才能紧密；党只有占领商会这块阵地，防止其他力量乘虚而入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组织党建布局才会完整。

(二) 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商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进入新时代，商会以其非营利性、专业性、互益性等特点，在提供多样化公共服务、引导群众有序协商解决矛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作为党和政府与基层民众间的桥梁，迅速壮大的商会组织成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关键力量之一。因此，提升商会党建工作质量，对于激发商会活力，引领商会在创新社会治理、参与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至关重要。

(三) 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内在要求

当前，商会存在党纪意识淡薄、内部治理不完善、违纪违法时有发生和监督难、监督软、监督散等问题。^[5] 2024年4月12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召开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全面从严治党暨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充分认识到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行业协会商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政治要求，是增强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必然要求，是在行业协会商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是行业协会商会规范管理、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哪个领域都不能拖后腿。商会党建工作作为社会组织乃至党的建设布局的重要板块，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找准痛点难点堵点，推动商会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向商会纵深推进，对于涵养积极健康、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促进商会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四) 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的战略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预示着奋斗目标的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商会等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亦是如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要求。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就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建设引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锻造向党组织靠拢的荣誉感和归属感。要增强党组织组织功能，就要重视发挥组织效能，提升对各要素进行整合调用的综合能力，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而促使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彼此贯通、相互借力，则要将

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商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提升商会党建规范化、制度化、有序化，创新党建工作模式，推动从“嵌入式”到“嵌合式”的转变，着力提升商会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造血、以自身业务反哺党的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6] 筑牢根本制度就要将“两个维护”贯彻到商会建设的各方面，强化政治功能，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用党的政治建设引领商会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用党的思想建设塑造商会的文化之魂。基本制度体现了内在规定性，是维护根本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完善基本制度，就要强化章程意识，建立健全维持商会良好运行的内控规章制度，比如用于强化党建工作的《商会党建工作岗位职责》《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风险防控清单》等，以及用于促进商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负责人选审核办法》《商会换届选举办法》《商会统一战线工作联络员制度》等，以此完善内部治理，规范外部行为，实现健康有序发展。创新重要制度，就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迭代，及时发现问题和漏洞，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新的制度，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上升为制度，促进党建工作机制更加精准对接业务发展所需，不断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转化为推动业务的发展优势。

二、商会党建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与问题

(一) 注重组织覆盖，但是组织功能未能有效发挥

截至目前，厦门市工商联147家所属商会共有128家成立了党组织，覆盖率为87%，自2020年以来覆盖率提升了14%，党组织覆盖率居全省首

位。建立了统战工作联络员制度，率先在全国工商联系统成立所属商会工会委员会，推动更多商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加入所属商会工会委员会。组织覆盖有明显增强，但党建工作还不扎实。一方面，商会党支部对党员教育、“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普遍带有畏难心理，难以像体制内单位那样严格落实各项组织制度；另一方面，商会党建工作的考核奖惩办法、党员教育管理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等尚未建立健全。

党建工作基础薄弱导致党组织的组织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一是党组织地位“虚化”，党员角色“边缘化”。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大多采取“兼职化”，党务工作者都有固定的非党务身份，无暇顾及党规规定的党员吸收、教育和管理；商会党员本职工作繁忙，长期游离于党组织之外，很难定期开展规范化组织生活；对党组织在商会中的地位把握不准使党员在参与党建活动时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束手束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二是党建工作方法、创新举措不多，形式陈旧。一些商会还停留在吸收体制内党组织经验的阶段，没有创新出一套与商会相适应的党建模式，在党建凝聚成员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等方面还未发挥出应有的效能。

(二) 注重强化政治引领，但党建与会建融合不充分

厦门市工商联指导所属商会党组织扎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列入“四好”商会量化考评的重要内容。如指导厦门市九江商会党支部联合11家在厦江西籍商会党支部开展“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讲会，组织召开了“以遵义会议精神赋能商会党建”等5场座谈会，就商会党建中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引导所属商会党组织负责人强化政治意识。

尽管厦门市商会党建高度重视加强政治引领，但在党建工作与商会发展充分融合方面仍有许多

工作要做，比如落实“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要求不到位，兼任党组织书记未完全覆盖，无法做到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多数商会党组织的负责人为离退休干部，话语权不高，影响力不大，开展党建工作缺乏主动性、常态化、吸引力，专业能力和精力均受限制。将党建与会建有效融合，面临阻碍的原因复杂：一是党组织对商会的影响力和决策参与度等作用的发挥，根本上取决于商会领导层对党建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而商会党组织容易被置于地位不高、说话不响、作用不大的尴尬境地，这就使得党员形成一种“本职工作重于政治角色”的观念。会员发展、党员成长、党组织活动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党组织就难以有效“嵌入”商会。二是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商会中设立党组织有政策依据，但“外生性”强于“内生性”。社会组织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领域，其沿袭传统的体制内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党建管理体制的做法不完全顺应社会组织特点和规律，致使一些商会党建工作难以发挥实质作用。因而，缺少强制制度安排，商会法人治理结构对党建的接纳程度大小不一，支持党建内生动力不足，党的执政资源难以融入，党的地位就容易弱化虚化边缘化，党的建设则难以真正成为商会和会员企业的内在需求。

（三）注重打造党建品牌，但没有树立牢固的全局观念

厦门市注重加强商会党建品牌建设，厦门市工商联党组于2021年4月指导厦门市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党支部等10家所属商会党组织组建了“红青庭”党建联盟，3年来先后开展了《喜迎七一——传承嘉庚精神，铸就蓝色梦想》等大型主题系列活动10余场，联盟成员单位扩展至19家，2023年底推荐参选《中华工商时报》“创新中国”工商联（商会）工作案例，商会党建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多数商会都已认识到利用品牌效应提升党建水平的重要性。然而，部分商会仍专注于打造党建

品牌，参加比赛，参选典型，并没有真正理解创建品牌背后的深层意义，即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的长远规划与长效机制。党建品牌“常擦常新”，其建设与管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然而一些商会在创建了品牌，也取得了荣誉后，就忽略了后期的长远策划、运行管理与适时更新。比如，部分商会缺乏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没有将党建纳入商会日常管理的重点，导致商会党建深度不足，缺乏长效性与生命力；一些商会缺失系统意识和战略思维，不能把党建工作与商会发展和会员企业的生产经营、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四）注重队伍素质提升，但基础要素保障力度不够

自2021年以来，厦门商会党组织负责人和统战工作联络员参加“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谱写商会党建新篇章”“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凝聚商会党建力量”等5期所属商会党组织负责人暨统战工作联络员培训班；以会代训组织所属商会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学习《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党组关于工商联党组对所属商会党建工作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意见（试行）》；组织所属商会党组织负责人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会、座谈会等。

尽管商会党务工作者的能力有明显提升，但尚未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人才培育体制机制，同时困扰着商会党建高质量发展的“三缺”诟病依旧顽固。商会党建仍面临着缺人才、缺经费、缺物资的困境，使得商会的权责与义务难以有效统一。以党务干部缺失为例，商会党建专业人才的理论研究和培养体系还不健全，人员配置、履职能力与党建要求失衡。党组织对商会领导人和业务骨干的吸纳能力不强，人员流动大，发展党员困难。厦门市商协会党组织现有党员总数2027人，其中组织关系转入商协会党员数591人，现有支部委员250人。商协会党支部书记中，男女比例为8:1，60岁以上31人，研究生9人、本科58人、大专42人。可见，厦门市

商协会党组织年龄结构偏大，力量相对薄弱，男女比例失衡。面对日益复杂的统战工作形势和日益繁重的事务性工作，抓党建往往力不从心，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大打折扣。

三、推动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强化政治引领，完善组织发展与党建会建融合机制

政治方向把控上，发挥制度优势，建立健全政治引领体系。党建引领商会发展是以商会的规范化建设为基础。强化党组织在商会中的引领作用，就要创新党组织参与商会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既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又要保持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既要让党组织履行好作为基层组织的基本职责，又要针对会员企业的发展实际找准党建工作切入点。^[7]在保证完成将党建工作写入商会章程、切实推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常规操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促使党的领导和商会依法自主相统一的有效措施。一是进一步取得上级党组织对商会党建的关心和指导。积极向上级党委建言献策把工商联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落实党委领导班子抓工商联工作的责任。政府要加大对工商联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建立健全联系工商联工作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工商联的联系和业务协作，为工商联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二是建立健全由党委组织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参加的商会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商会党建工作的文件、讲话和指示精神，规划和指导全市商会党建工作，通报商会党建工作进展，公布拟出台的有关加强党建工作的政策性规定和具体措施，协调涉及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和部门参与的有关工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建立市工商联、民政部门、组织部门等部门常态化沟通机制，提高各级资源配备的利用

率。三是加强商会党建工作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制定。社会组织领域党内法规不完善、位阶低、可操作性弱^[8]，在中央相关法规没出台之前，地方党委可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规范性文件，使商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更明确的、指示性强的党内法规依据。

组织形态重构上，创新模式形式，建立健全组织发展体系。从班子成员到党员对象，商会党组织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身份多重、事务繁忙，这对党建活动的开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围绕商会健康发展、贴近会员需求，创新党建活动。商会开展党建活动，既要防止将严肃的组织生活随意化、庸俗化，也要防止形式化、套路化，教条式照搬党政机关做法。在坚持“一方隶属、参加多重组织生活”的基础上，创新党建工作手段。^[8]例如，发挥互联网优势，灵活运用新媒体，开展网上会议、网上党课，落实组织生活制度；促进党组织学习教育与商会会议活动相结合，创建政企对接、产学研协作等各类服务平台。二是搭建商会与政府机关、社会资源交流合作的平台，为民营企业解决问题、抵御风险。多深入所属商会走访调研，了解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状况，从需求侧出发制定党建供给侧的服务措施。建立驻会班子成员对口联系制度和常执委企业工作制度，畅通政商对话渠道。三是畅通商会党组织党员发展渠道。工商联要帮助有入党意愿的商会所属人员，特别是商会管理层和业务骨干，争取党员发展指标，重点在只有个别党员的商会中积极发展党员。商会领导层中党员确实少的，组织部门、上级管理单位可考虑选派适合人选进入。主动协调组织部门把党员发展指标向有发展党员权利的党组织“定向”倾斜。^[8]四是扩展将功能性党组织变为实体性党组织的途径。探索在管理体制顺畅、机构职能清晰、规章制度健全、专职人员较多的商会，成立实体性党组织，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在商会中的定位，细化梳理职责、功能。

（二）统筹资源协同，健全领导协调与运行保障机制

构建长效运行保障机制，就要将资源调配能力的软建设与基础条件支撑的硬保障相结合。一方面，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健全领导协调体系。商会双重管理体制广受诟病，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商会党组织关系和党建工作隶属情况复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要求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由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领导和管理，接受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的指导。在实践中，商会由民政部门行使登记管理职能，民政部门委托工商联行使业务指导职能。这就导致管事的部门没有审批权力，有审批权力的部门不管事。^[9]比如，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128家所属商协会党组织，隶属街镇党工委90家、隶属工业园区8家、隶属厦门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综合党委13家、隶属厦门市工信局直属党委5家、隶属外地驻厦党委11家、隶属厦门市委统战部机关党委1家。厦门市工商联所属商会行业党委为功能型非建制性党委，无专门工作机构编制和人员职数配备，抓商会党建工作的力量比较薄弱，目前尚未对所属商协会党组织履行管理和领导职能。商会注册在民政部门，业务主管在工商联，党建主管隶属市委两新工委，多头管理或指导，缺少一个牵头的总负责单位，存在着谁都管但都管不到位的现象，推诿扯皮时有发生。

做好商会党建工作的前提，在于系统梳理党委、组织部门、两新工委、工商联等部门关系，进一步理顺党建工作体制机制、管理模式、隶属情况以及市工商联所属商会行业党委的责任。其一，明确各部门责任分工，规范“隶属关系”与“联系关系”，减少内耗。“隶属关系”的上级党组织履行全面领导的职责，“联系关系”的上级党组织履行业务指导的职责。^[10]在组织部门、民政部门 and 工商部门等部门中确定一个商会党建管理的牵头单位，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以加强党的领导协调力度，提升商会党组织基础建设水平。其二，随着商会党建工作的推进，组织覆盖面必然逐步扩大，数量增多，而作为管理部门的工商联受人员编制的限制，“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会更加凸显，建议给予人员编制支持，探索专人定编定岗。^[11]工商联应努力扩大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所属商会范围，实施商会统一归口工商联业务主管，并由工商联党建工作部门领导和管理其党建工作，同时探索商会业务指导和党建指导均由工商联代行管理职能的运行体制。

另一方面，夯实基础条件，建立健全长效运行保障体系。不同于党政机关健全有力的保障机制，活动经费短缺、活动空间受限、活动流于形式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商会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切实加强经费、场地等制度性保障是商会党建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是强化财政支撑保障。加强与党委组织部门和两新工委的沟通协调，推动政府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财力支撑机制，将商会党建的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尽快形成与地方财政同步增长的机制，解决好经费主渠道问题。建立多渠道筹集解决机制，推动加强政府与商会的合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商会党建专职人员实行经费补贴。探索设立商会党建工作基金，市委和市政府可考虑设立奖项、称号，通过奖励的形式激励商会党建人才工作积极性。^[11]二是为商会建立规范的活动场所创造条件，制定商会党组织阵地建设标准。对于尚不具备独立创建活动阵地的商会，市委市政府可因地制宜、整合资源，积极促成商会与所在社区联合共建，社区为商会提供党建活动阵地。^[11]三是强化制度规范保障。结合实际，推动建立健全一系列工作和管理制度，比如，党组织负责人年度述职考核工作机制、基层党委抓商会党建工作责任机制、商会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商会党建工作定期研究机制、商会党建工作指导督导机制、党建工作考评机制、经费保障制度、组织关系接转制度、党员活动制度、

党员权利保障制度、考核奖惩机制等，为推进商会党建工作提供系统全面的制度保障。四是推动党建工作智治。探索打造商会党建大数据库，把该数据库纳入全市党建一体化大数据协同创新体系之中，使党建大数据在社会组织党建情况研判、组织协调商会党组织、优化社会治理、应对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综合治理和服务功能。同时，注重做好数据的存储、共享、保密等信息应用与安全工作。

（三）聚焦人才培育，构建绩效考评与能力发展协同机制

从内生动力与效能优化维度看，以人才能力建设为核心，通过考评激励与发展培养双向发力，驱动组织效能提升。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绩效考评体系。党建工作往往因责任考评机制缺失导致党组织建设难以规范化。要构建科学系统、客观理性的商会党建工作综合考核评价机制，首要的就是确定统一指标。衡量和评价商会党建工作的情况和成效，应包含领导班子、党员队伍、运行机制、发展业绩、会员反馈等方面。具体要全面考量商会发展活力（比如维权服务、人才教育、经贸交流、创新能力、融资能力）、商会的内部和谐度（比如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度、内控制度完善程度）、商会的外部和谐度（比如公共关系危机处理、社会认可和参与、政府政策支持、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活动）、商会法人代表政治素养（比如支持党建工作的程度、政治敏锐度和判断力、理论水平和政策理解、奉献精神）、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的政治本领（比如工作作为和地位威信、群众工作、改革创新、狠抓落实）、商会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比如党员队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种制度健全和落实情况、促进会员生产经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的服务种类）等方面。考评机制建立后，要注重严格执行并切实发挥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相应制定纪律与监督办法，要能够通过考核评价提高全体商会成员的党建意识，并转

化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举措，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的效果。

另一方面，服务人才成长，建立健全队伍培养体系。首先，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商会党组织书记主持商会党建全面工作，抓好书记能力建设，直接影响到商会的战斗力凝聚力。要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选优配强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12]一是优化选人标准。作为党建第一责任人，要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搞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带头抓班子带队伍，带头依法办事，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带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二是完善选任程序。规范推荐、提名、考察、选举、公示、试用、转正等选任程序，建立健全全市商会党组织书记任前考察工作机制，提高群众会员对书记任免意见的参与权重，整体提升党组织书记候选人的素质和能力，实现为民所选、为民所用。三是创新渠道建立储备库。注重从商会内部选任支持党建、能力突出的党员担任书记。打破行业、地域、身份等界限，有意识地把市区县乡镇机关退休的党务干部、本地致富能手、退伍士兵、返乡创业党员等收录人才库。四是加大党组织书记培训力度。将商会党组织书记教育培训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形成上级组织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商会党组织书记教育培训体系。健全学习制度，创新培训方式，加强基础培训，充分发挥党校和远程教育接收站点的主阵地作用，采取理论学习、经验交流和实地指导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培训。其次，加强党务工作者能力建设。一是多渠道多样化选用党务人才。把商会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党员骨干培养成党务工作者和党组织负责人。二是加强党务工作者教育培训。把党务工作者纳入基层党员干部培训总体规划，重点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内法规、党务知识、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教育。

三是完善党务人才管理。积极探索针对商会党务工作者的党建工作激励机制，着重解决他们的政治待遇和发展空间问题。在政治荣誉上，适当向党务工作者倾斜；在职业规划上，对其参政议政和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路径作出制度化安排，鼓励参政议政、干部选拔培养链向社会组织延伸；在发展机会上，探索建立选拔优秀商会党务工作者到工商联或其他党委政府机关挂职锻炼制度。再次，充实壮大党员人才队伍。针对当前商会组织党员人数少、党组织不稳定，创新党员发展方式，扩充党员队伍。一是健全党员骨干孵化办法。制定党员发展计划，定期召开推荐党员发展对象会议。始终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慎重均衡地在年纪轻、学历高、觉悟强的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和预备党员教育考察。二是加强党员队伍素质建设。设立相对固定的“党员教育活动日”，强化党员参与教育活动的考勤制度，监督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情况；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开展增强服务能力和执行能力的针对性培训。

（四）突出激励导向，建立和谐共建与融合发展促进机制

通过激励赋能与关系重构营造良性生态，以融合发展破解“两张皮”问题。一是构建和谐商会，建立健全工作激励体系。找准与商会发展的利益契合点是商会党建的关键所在。商会党组织代表国家、商会、党员、会员的总体利益，能够保证从集体、长远的角度出发协调商会领导层、党组织负责人、会员企业等多对关系，参与规划商会发展，促进达成发展共识。因此，构建和谐商会作为商会党建的核心目标，可以成为党组织嵌入商会的工作结合点。其一，激励会员企业。通过加强教育和思想引领、将商会党建活动的参与情况与会员企业的社会贡献评价挂钩、切实解决生产经营难题等手段，增强会员企业支持商会党建的主动性。考虑将其支持党建工作情况作为评先评优以及参选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的必要条件，激发其政治荣誉感。其二，激励党务工作者。利用和创造一些参与形式和授权形式，比如开展“党员先锋工程”，提升党务工作者在工作中的威信。拓展党务工作者的个人晋升空间，提高落实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将物质激励与荣誉激励相结合，给予适当工作津贴，注重推荐优秀党组织负责人作为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等各类先进人物人选。上级党委、政府要有意识地通过党组织联系落实对商会的扶持优惠政策，提升党组织在商会中的地位 and 影响。二是找准契合点，建立健全党建会建发展相融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党建工作与商会发展相融合的契合点就是商会参与社会治理。作为关键的社会治理主体，商会既能在调解矛盾纠纷、监督企业诚信经营等方面辅助党委和政府管理社会，也可在承接政府部分职能转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与政府合作，还能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国际交流和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党委和政府做不到的补充作用。

要使党的建设与商会建设有机相融，就要发挥商会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理念深入融入商会党组织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党组织赋能商会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分类指导、帮助商会制定相关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方案，创新和优化自身为商会服务的功能，深化党组织对商会参与社会治理和商会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7]其次，创建党建联建平台，充分发挥工商联、商会等平台优势，以党建联建形式，解决新发展阶段的社会热点，如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问题，建立健全商会、企业的交流和展示渠道、机制，启发思路，持续激发商会党建工作的生机活力。再次，把“党建”作为对会员企业的重要服务内容。在保证完成将党建工作保障、促进会员企业发展写入章

程等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党组织要主动对商会重大决策、重点工作加强研究,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商会和党组织年度工作计划要共同研究,统筹谋划。商会年度例会和重大活动,要安排部署党建内容,并辐射、教育到更多会员群体。最后,党组织要坚持“参与不干预、协商不命令、献策不决策、引导不强制”的原则,确保权力的边界是清晰的,不要对商会日常的业务工作指手画脚、帮倒忙,造成负担。要着眼于培育内生动力,增强党建自觉性,使商会更好地“自治”。

进一步激发商会活力和创造力,是加强和推进商会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化平台”“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等的要求。要落实这一要求,就要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加强相关领域的党建研究,找到党建工作推动商会等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最佳契合点。商会党组织要将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商会、服务企业作为指导思想,树立有作为才有作用的理念,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成效巩固自身在会员企业中的地位,以服务聚人心,探索加强商会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的新路子,积极争取商会成员对党建工作的支持,推动商会党建工作从“弱化虚化边缘化”向“强化实化中心化”转变,实现党的建设与商会发展的和谐共赢。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

量发展[EB/OL]. (2024-11-07) [2025-01-20] <https://news.cri.cn/20241107/79882861-ddd0-f153-5257-46446a88d45f.html>.

- [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3] 郑海鸥, 刘润函, 杨昊.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N]. 人民日报, 2023-03-07(02).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352.
- [5] 中央社会工作部召开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工作会议[J]. 中国集体经济, 2024(17): 10.
- [6]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J]. 共产党员, 2024(15): 8-23.
- [7] 江华, 周莹. 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业协会商会党建研究[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8(05): 96-102.
- [8] 祝序彬, 刘世波. 工商联所属商会党组织建设体制机制问题探析[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01): 9-12.
- [9] 金庭碧. 论商会党组织建设的破题之策——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01): 22-28.
- [10] 金庭碧. 基层商会党组织建设的创新与思考: 以长沙市雨花区基层商会党组织建设为例[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02): 51-56.
- [11] 江夏区工商联课题组. 关于加强商会党建的思考和建设——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J]. 长江论坛, 2020(06): 38-42.
- [1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J]. 大社会, 2019(02): 33-35.

责任编辑: 魏璐珂

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创新

李 宁 潘江滨

(福建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两岸高等教育融合作为深化经济社会融合的战略突破口, 正面临动力结构失衡、制度性壁垒及文化认同弱化三重困境。当前合作模式多呈现外生政策主导与项目试点推进的特征, 尚未形成融合发展的内生性动力系统。通过构建市场驱动、创新供给、政策引导、文化赋能的“四轮协同”动力模型, 探索顶层设计、地方实践、基层创新的三级联动实践路径, 系统解构动力错配与制度梗阻问题, 旨在为两岸教育融合提供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探索特色化区域协同发展路径。

关键词: 高等教育; 融合发展; 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67-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各领域融合发展”, 将两岸融合发展的范围从社会经济领域拓展至社会各个领域, 高等教育融合发展被赋予了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筑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2023 年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2024 年教育部出台《教育领域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高等教育融合成为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形势与挑战。

一、融合发展困境的多维透视

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长期受困于“浅层合作”陷阱, 面临从“浅层合作”到“深度融合”的动力结构障碍, 这一动力结构障碍根植于政治、制度与社会心理的多重张力。两岸关系的周期性波动直接传导至教育合作领域, 形成难以逾越的政治壁垒。

(一) 两岸关系波动下的教育合作脆弱性

福建源于与台湾的“五缘优势”, 处于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 承载着先行先试探索融合路径的特殊历史使命, 在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融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战略责任, 闽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长期实践为两岸融合提供了可靠的经验。2008-2016 年间, 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闽台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FJ2024BF055)”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 宁, 博士, 福建理工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区域高
等教育发展, 大学发展规划与战略管理;

潘江滨, 福建理工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政治互信增强,教育合作进入“黄金期”。2012 学年大陆赴台学生数为 17454 人,此后五个学年持续走高。2016 学年大陆赴台学生达 4 万多人,约占台湾境外生总数的 30%。^[1]福建成为两岸高校合作交流最为密集的地区,与台湾高校合作专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电子通信业、建筑业、旅游业、现代农业等紧缺人才领域。^[2]2016-2024 年,两岸紧张形势不断攀升,加之新冠疫情影响,教育合作进入低谷。大陆赴台就读学生规模急剧收缩,2021 学年降至 4293 人,相较 2016 学年人数高峰时期少了近九成。《意见》和《若干措施》的相继出台,提出支持两岸高校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与多元化合作,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开始复苏。两岸关系的周期性波动对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的影响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政策环境的变化直接塑造了合作的规模、形式与深度。

(二) “政策驱动”下的非对称性合作

两岸高等教育合作自 21 世纪初全面启动以来,形成以政策框架为主要支撑的发展格局。这种“政策驱动强、市场驱动弱”的非对称性特征,既体现了制度性安排对区域教育交流的关键引导作用,也反映出民间主体活力与市场需求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的现实困境。如教育部制定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暂行规定》、中国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定规定等制度文件,建立了台湾学生赴大陆升学的“联合招生考试”“学测成绩申请”等多元渠道。2010 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明确提出“鼓励两岸高校合作办学、互认学历学位”等目标。在政策推动下,两岸高校间的“官方对接型”合作项目迅速发展。2012 年启动的“海峡两岸高校校长论坛”已成为制度化交流平台,累计促成 120 余所大陆高校与台湾高校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学分互认、师生互换、联合培养等领域。而与政策层面的积极推进形成鲜明对比,市场机制在两岸高等教育

合作中的作用显著滞后。从需求端看,企业与社会机构的参与度偏低。尽管大陆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产业对两岸联合培养的技术型人才需求旺盛,但校企合作多集中于政府主导的“产教融合试点”项目,且多数依赖财政补贴维持运行。

(三) 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制度性壁垒

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制度性壁垒集中表现为学位学历互认机制的流程性梗阻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结构性低效。学位学历互认作为人才流动的基础性制度,其梗阻集中体现为认证周期长、流程复杂及标准差异。两岸在学位授予标准、学业成绩报告形式、绩点换算规则等细节上仍存差异,导致台湾学生赴大陆升学时,申请者需额外提交课程描述、学分认定等补充材料,认证周期较长,部分学生因认证流程繁琐转向申请欧美高校。同时,技术层面的互信机制缺失进一步加剧了梗阻,两岸尚未建立类似的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仍依赖第三方机构人工审核,导致认证成本较高。产学研协同存在“玻璃门”现象。尽管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形式上倡导合作,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一系列隐形的制度障碍、利益冲突或机制壁垒,导致合作难以真正落地或发挥实效,出现合作层次低、资源配置失衡及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等问题。

(四) 两岸民众社会心理认同的“温差效应”

在两岸交流持续深化的进程中,因历史记忆、身份认知、价值观念差异形成的社会心理认同“温差效应”成为影响融合深度的隐性壁垒。这种认知层面的“温差”首先体现于对教育质量的差异化评价。台湾青年认可两岸教育合作提升职场竞争力,但却对大陆学术评价体系的国际公信力存有质疑。其次,两地虽共享方言、习俗等“文化近缘”优势,但源于中国台湾地区长期存在的“地域化”叙事,出现“文化近缘而认知远化”的现象。更深层的制度性区隔体现在两岸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校园文化符号、知识生产范式等方面,台湾高校普遍采用

“西方中心”的学术评价标准，大陆则强调“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导致两岸联合培养学生学术适应期较长，部分学生因无法适应多重评价标准而选择中断学业。

二、跨学科分析范式的创新性整合

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所面临的动力失衡、制度壁垒及文化认同重构等复合型困境，实质是跨区域制度性互动与多元利益博弈的叠加产物。这既涉及政治学中的跨境治理规则冲突，又涵盖社会学的文化认同解构与重塑，唯有构建多学科交叉的分析范式，才能拆解制度性互动的动态机制，破解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局。

（一）理论耦合的逻辑基础

社会动力学强调社会系统中各要素的动态互动，而制度主义关注规则体系对行为的塑造作用，二者的耦合点在于制度既是社会结构的固化形态，又在主体互动中持续演进。借鉴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本研究将两岸教育合作视为由多重动力驱动的开放系统，经济逻辑提供物质基础，教育规律决定知识生产方式，政策框架设定制度边界，文化心理认同影响主体参与意愿，四者通过“动力输入—制度中介—行为输出”形成循环作用。

（二）建立“宏观—中观—微观”三级传导机制

在闽台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复杂系统中，“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微观行动者”三级传导机制构成了制度运行的核心脉络。这一机制以制度主义理论为根基，强调宏观制度框架通过中观组织运行规则的转化，形成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引导与规范，同时微观行动的实践反作用于中观制度调适与宏观结构优化，从而构建起上下联动、动态耦合的融合发展体系。

宏观制度作为系统运行的顶层框架，通过政策制度设计、战略规划实施与法治保障建设的系统整

合，为闽台高等教育融合提供基础性制度供给，解决“为什么融”“融什么”及“如何融”的方向性问题。中观组织是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的“中间转换器”，通过建立高校、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内部规则与协作机制，将宏观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流程与行动框架。微观行动者，诸如师生、企业、社会机构等，他们的实践行为是制度效能的最终检验，其基于系统环境的能动反馈又反作用于中观组织与宏观制度的优化。三级传导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制度目标的一致性、规则转化的精准性与行为反馈的畅通性。

三、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四轮协同”动力机制

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四轮协同”驱动模式，遵循“市场—技术—制度—文化”的实践路径，构建“市场驱动、创新供给、政策引导、文化赋能”相互嵌套、动态耦合的协同动力体系。

（一）市场驱动轮：资源配置的底层牵引力

经济发展需求作为内生动力，深刻牵引着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的方向与进程。

1. 随着大陆产业向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加速转型，台湾半导体、精密制造等优势产业寻求产能外溢与市场纵深拓展，双方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精密机械、生物科技、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的合作需求将逐步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性合作催生复合型技能缺口，通过“技能需求—教育供给”的传导链，倒逼高等教育供给体系适应性变革。

2. 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通过经济引力形成资源再配置动力，推动教育合作从“物理叠加”向“化学融合”演进。在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资本、技术、人才等核心要素的跨境流动产生显著的集聚效应与协同效应。以闽台合作为例，台资企业在福建电子信息、石化、机械、船舶、冶金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等产业领域的布局形成对专业技术

人才与科研创新的迫切需求，这种经济引力促使两岸高校突破地域与制度壁垒，推动教育资源从简单的学生交换、师资互派等“物理叠加”模式，向教育理念、培养模式、校企深度合作等制度创新与要素重组的“化学融合”阶段跃迁。

（二）创新供给轮：知识生产的核心驱动力

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与文明传承的策源地，不仅推动两岸高等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更驱动合作模式从“项目驱动”向“生态共建”演进。两岸学科专业优势上的互补性，催生知识协同进化的内在动力。

1. 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教育本质在于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与社会责任感的“完整的人”。两岸教育理念的融合为人才培养提供新路径，台湾高校注重“全人教育”，强调人文素养，开设“跨领域学习”课程。例如，两岸高校联合开展以“闽台‘研’趣，‘媒’好未来”为主题的研习实践，围绕自然、人文、科技等领域精心设计一系列历史文化实景课程和沉浸式观影教学，促使两岸青年“双向奔赴”，增强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情感和文化素养。^[3]

2. 文化传承的共同体建构需求。教育系统承担着文化认同建构的使命。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使教育合作成为文明对话的天然载体。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通过联合培养人才、师资双向互动、深化校企合作、打造多样化全学段文化教育交流平台，传承中华文脉，培养文化共同体意识。例如，福建师范大学联合台湾中华文化教育学会，率先实施两岸合编高中语文教材项目，教材内容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选两岸中学教材长期共选的经典名篇作品。^[4]此类合作不仅实现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更在青年群体中培育“两岸一家亲”的情感认同，提升两岸学生对两岸文化同源性的认知深度。上述三重需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知识生产—人才培养—文明传承”闭环形成协同效应。

（三）政策引导轮：制度环境的关键塑造力

政策系统的外部推动力在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中扮演着“制度引擎”的关键角色，通过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与规则重构，将政治意愿转化为合作动能。

1. 国家层面上，《意见》明确将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纳入战略框架；《若干措施》进一步细化操作路径，如支持闽台高校共建特色学科、联合实验室，简化台湾教师来闽任教的资格认证流程等。在政策突破的直接推动下，截至2022年福建全省具备面向台湾地区招生资格高校27所，累计8000多名台生来闽就读；与118所台湾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开展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216个，培养技术技能人才2.4万人；建设4个两岸教师发展中心、7个两岸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基地，培训两岸教师3000多名。支持高校开展闽台科研合作项目102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发明专利15项。^[5]

2. 地方政策则通过“精准滴灌”强化落地效能。福建省创新“一揽子”支持体系，设置闽台合作办学项目给予专项支持，允许自主设定学费标准；建立“省台港澳办—教育厅—高校”三级联动机制，营造“软环境”降低合作成本。2021年，福建省公布225条在闽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清单，清单涵盖经济、社会、文教、便利化等四个领域，涉及文旅旅游、用地需求、衣食住行、就业创业、文教交流等诸多方面^[6]，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为在闽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共建第一家园。

（四）文化赋能轮：文化融合的隐性粘合力

社会心理系统的文化促动力，构成了闽台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深层隐性纽带。作为两岸同根同源文化基因在心理层面的具象化表达，这种促动力通过集体记忆唤醒、身份认同建构与情感共鸣强化，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教育合作的内生动能。

同源文化传统构成两岸社会心理的深层联结，共同文化背景赋予两岸师生相似的认知框架与意义阐释系统，使“同文同种”的文化身份认同成为

教育合作的情感基础。在教育实践中,对“中华文化”这一超地域概念的共同归属,推动双方超越政治分歧,在学术研究、课程开发、人才培养等领域寻求合作共识,形成“文化认同—教育合作—价值共创”的良性循环。相较于政策推动的显性激励或经济合作的利益驱动,文化力量通过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构建教育融合的深层认同机制。它使两岸师生在学术争鸣中保持对话耐心,在制度差异中寻求合作空间,在价值碰撞中凝聚共识底线。这种心理韧性不仅降低合作中的摩擦成本,更赋予教育融合抵御外部干扰的稳定性,即便面临政治波动,文化纽带仍能维系民间教育交流的延续性。

社会心理系统的文化促动力是两岸教育融合的“精神底盘”。它以文化记忆为锚点,以身份认同为纽带,以情感共鸣为润滑剂,将抽象的文化共性转化为具体的合作动能。数字化时代,文化促动力正经历形态革新。数字文化记忆库、虚拟现实文化体验项目等,使传统文化符号突破时空限制,以沉浸式、互动性的方式重构青年一代的文化认知。这种技术赋能的文化传播,既延续了传统的心理联结,又注入现代性元素,使文化促动力在世代群体中焕发新生,为两岸高等教育突破现实藩篱、实现深层融合提供不竭的心理支撑。

四、构建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三级联动推进策略

(一) 宏观顶层设计: 国家战略的宏观引领与制度保障

政策统筹与规则对接是破除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制度性障碍的核心路径。通过推动《意见》向教育领域延伸,以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促进相关条例为制度基石,明确学位认证协同化、师资互聘规范化与科研合作制度化等三大核心规则。加强两岸高校科研成果共享的制度建设,明确联合研发项目的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原则及数据跨境流动规范,实现“政策—规则—资源”闭环,为两岸高等教育

从“浅层次交流”迈向“深层次融合”提供长效制度保障。

1. 可借鉴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规则衔接”经验,在课程大纲设计、教学评价体系、学分累积制度等方面开展衔接、互认和融合发展等探索。这种制度弹性既能降低台湾高校参与合作的适应成本,又为大陆教育改革提供观察窗口,最终推动两岸教育规则从“差异并存”走向“融合统一”。

2. 构筑“基金支持—平台管理—动态评估”三位一体的资源配置体系,提高资源配置的精准性与系统性。建立“绩效导向”的资源分配机制,依据平台监测数据调整资金流向。对成效显著的项目追加资助,对进展迟缓或偏离目标的项目及时优化或终止,确保资源向高价值领域集中。

(二) 中观制度创新: 组织场域重构与运行机制的转化落地

中观制度作为衔接宏观政策框架与微观实践行为的枢纽层,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组织场域重构与规则系统再造,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秩序。

1. 构建由多所高校基于共同的战略目标、利益诉求或特定的合作领域而组成的稳定的高校共建联盟。高校共建联盟本质上是跨越制度边界的组织场域重构过程,其核心在于共建弹性化契约框架与适应性治理结构,以消解两岸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摩擦,为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提供超越简单资源叠加的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动态平衡稳定性与灵活性,中观制度将逐步推动闽台教育合作从“项目驱动”迈向“制度驱动”的新阶段。

2. 行业组织通过标准制定与风险管理工具创新,推动中观规则从形式合规向实质效能转型,构建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质量保障与风险缓冲体系。行业标准需突破传统合规性指标束缚,建立“过程—结果—影响”三位一体的评估框架,如设定“双师型”教师比例,规定两岸联合教研活动、跨校课程

研讨活动频次等过程性指标,确保教育理念与方法的深度交融。引入增值评价模型,测量学生跨文化能力、技术创新素养等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幅度,要求合作项目毕业生在上述维度显著高于非合作项目。设立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采用“梯度共担”,低风险项目由参与高校共担损失,中高风险项目触发保险赔付,同时配套应急周转金制度保障师生权益。未来需进一步强化行业组织的标准治理能力,深化高校联盟的规则协同创新,使中观制度真正成为两岸教育融合的稳定器与加速器。

(三) 微观行动者的利益博弈:行为选择与实践创新的能动反馈

微观行动者的利益博弈本质上是资源分配与权力重构的过程。在两岸高等教育融合进程中,微观行动者的利益博弈构成推动或制约合作深化的底层逻辑。

1. 学生群体的利益博弈聚焦于教育资源获取与职业发展预期。大陆学生倾向通过合作项目获取台湾高校的实践教学资源与国际交流机会,而台湾学生更关注大陆广阔的就业市场与科研平台。但政策壁垒与认知偏差常导致其利益实现受阻。这种博弈促使学生群体形成“用脚投票”机制。

2. 教师群体的利益博弈集中于学术发展与职业认同。大陆教师期望借助台湾同行的国际化视野提升科研影响力,台湾教师则看重大陆的科研经费支持与产业对接资源。然而,两岸学术评价体系差异构成核心冲突。此类案例推动高校联盟建立“双轨评价机制”,允许教师自主选择两岸标准进行成果认定,平衡双方利益诉求。

3. 高校管理者的博弈焦点在于资源竞争与声誉构建。大陆高校希望通过合作吸纳台湾高校的优质生源与国际排名权重,台湾高校则试图拓展大陆

市场以缓解岛内少子化危机。但合作中的主导权争夺常引发摩擦,或通过“轮值院长制”“双主席制”达成妥协,既保障双方话语权,又降低合作风险。

4. 企业作为关键行动者,其利益博弈围绕人才供需匹配展开。台资企业需确保高校培养的人才符合制程技术升级需求,而高校担忧企业过度干预学术自由。博弈结果催生“订单式培养”改良模式,企业通过捐赠设备、提供实训基地换取课程定制权,但需接受高校对培养方案实施终极审核,最终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 [1] 赴台大陆学生数量五年内下降九成 台学者吁当局尽快改善两岸关系[EB/OL].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28290487127310889/?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wid=1743480739314, 2022-08-05.
- [2] 储白珊,蒋丰蔓.探索产教融合的闽台范式[EB/OL]. https://news.xmnn.cn/fjxw/202404/t20240417_138096.html, 2024-04-17.
- [3] 刘深魁.台湾青年学子来闽研学[EB/OL]. http://taihai.fjsen.com/2024-11/25/content_31786999.htm, 2024-11-25.
- [4] 张盼.两岸合编语文教材在台受欢迎[EB/OL]. <http://tw.people.com.cn/n1/2018/1210/c14657-30452439.html>. 人民网, 2018-12-10.
- [5] 教育部“云”访福建:来看两岸教育融合发展的“福建样板”[EB/OL]. https://jyt.fj.gov.cn/jyyw/jyt/202209/t20220922_5997961.htm, 2022-09-22.
- [6] 福建公布在闽台胞企企同等待遇清单 首批225条[EB/OL]. <http://www.mnw.cn/news/fj/2348413.html>, 2021-01-02.

责任编辑:兰丰丰

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 现实根基、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杨頔媛

(重庆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16)

摘要：数智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智能时代，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进一步巩固注入了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风险与难题。例如，“西方文化优越论”“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依托数智技术传播，以更具迷惑性、隐蔽性的形式蔓延，严重冲击了我国文化安全体系并掣肘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这些风险与难题已然成为亟须破解的时代课题。运用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要秉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审慎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从巩固文化主体、活化文化 IP、强化文化输出等方面着手，抓好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础、关键与重点工作，从根本上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全新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数智技术；文化主体性；实践进路；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72(2025)04-073-08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新时代新起点，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巩固。随着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广泛渗透，中华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数字化与中华文化融合共进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当代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问题，源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命题。在数智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下寻求突破，关乎现代化与全球化交融背景中中国文化的存续发展。

为此，深入剖析数智技术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的现实根基，厘清数智技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理路，积极探索数字化背景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效实践进路，不仅对于巩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培塑中华文化的民族性自觉与世界性观照具有深远影响。

一、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现实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2]厘清文化主体性的构成

作者简介：杨頔媛，重庆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素、明晰数智技术运用的必要性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必要性，为处在数智技术迭代升级时代的中华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以中华文化新辉煌助力我国文化强国目标顺利实现。

（一）民族、人民、政党构成当代中国主要文化主体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3]一方面，文化主体意识内蕴着中华民族及其成员对于自身文化的深度体认、虔诚信仰、自发追求以及基于理性的建构。它不仅体现为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全面肯定，更彰显于对文化本质、发展脉络的深刻洞悉与主动践行，是一种在文化认知与实践层面的高度自觉。

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表达。其一是民族主体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文化在借鉴其他文化的同时，始终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思想，使得中华文化在借鉴学习其他文化时，保持自身特质，不断推动自身发展。其二是人民主体性，即人民群众文化实践的主体性。中华文明是千千万万华夏儿女在社会中生存历练来的价值总结和智慧，是维系华夏儿女绵延不可分割的血脉的重要纽带。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5]1857}并坚定回答，“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5]1012}。文化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建设文化的主体性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的民族主体性、政党主体性、人民主体性指向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三是政党主体性，即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即为

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有力彰显。这一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孕育并蓬勃发展，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性。

（二）数智技术在文化主体中实现广泛运用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8.6%。以短视频为例，每日活跃用户数已超过8亿，用户平均每日使用时长超过两小时。^[7]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数智技术已逐步渗透到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化领域的广泛运用更是为大众带来全新体验与无限可能。一是在文化创作层面，以往受限于创作工具和表现形式，许多普通人的创作灵感难以充分施展。如今，借助简单易上手的数智创作软件，哪怕毫无专业背景的民众，也能通过手机、电脑进行绘画、音乐制作、短视频创作等。比如一些音乐创作APP，内置丰富的乐器采样和节奏模板，用户只需拖动音符、调整参数，就能谱出原创音乐，极大激发了大众的创作热情。二是在文化传播阶段，数智技术的广泛运用建构起多元、高效的传播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算法推荐，依据用户的文化偏好，精准推送各类文化内容。偏远地区的群众足不出户，就能通过短视频、直播，领略到各地的风土人情、传统技艺。再如数智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以往传统影院、电视、音乐会、演出、实体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线下物理空间的限制，随之产生的线上博物馆、数字图书馆等让珍贵文化资源突破了时空限制，只要有网络，人们能随时随地尽情遨游知识海洋。三是在文化体验上，数智技术创造出沉浸式的场景。文旅景区运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建构起强大的文旅科技支撑体系，为游客打造穿越历史的游览体验。民众戴上设备，就仿佛回到古代，与历史人物“对话”，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数智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普及，让人民群众

从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创造者，真正成为文化发展的主体，推动文化不断繁荣兴盛。

（三）新质生产力赋予“文化主体性”坚实支撑

202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8]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推进我国新时代文化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9]虽然数智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我国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取得一定建树，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数智时代文化发展的各类矛盾和诸多问题，文化发展不平衡、不稳定、主体弱化现象仍然突出。新质生产力正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成为数智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数智时代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文化发展、文化建设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全面升级，满足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创新表达内容与形式的需求，进一步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

二、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逻辑追溯

研发并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裸眼 3D、全息投影等新兴数智技术，能够有效打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智能生活的壁垒，“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2]，进而采取有效措施让中华文明不断传承发扬下去，并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焕发出新的活力。当前，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囊括了文化主体性时代表达叙事、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现实需要与“具身智能”时代现实催化。

（一）巩固文化主体性彰显时代性表达叙事

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文明的果实”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10]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进步概

念可等同表达为“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11]。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表达在国际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与民族文化主体性展现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数智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使世界各国争相抢夺技术的“制高点”。然而世界舆论仍呈现以美国为首的“西强东弱”局势，其宣扬“数字自由”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推行“数据霸权”。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文化主体性巩固与文化自信建构成不小阻碍。究其原因，是西方国家凭借数字智能核心技术优势在对外战略中实施计算宣传，破坏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叙事，妄想在我国传播错误思潮，弱化我国文化主体性以期阻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12]当今世界离不开数智技术的硬性支持，数智技术作为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发展的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我国文化发展与文化主体性建构互相推动

“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15]文明发展关乎国家未来走向，正是中华文明古往今来发展的包容性与自主性，才能完整地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且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智技术融合，中华文明在面临世界未有之变局时，依旧能够谱写出中华文明新的壮丽篇章。一方面数智时代我国面临西方势力渗透与恶意打压的困境促使我国加快文化数字化发展进程。《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要求推进我国文化资源、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数字化进程；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等，为摆脱西方不良势力的传播干扰并大力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广泛运用显示出我国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13]由此可见，数智技术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助力，而文化主体性则如同源头活水，反哺并推动着中华文明持续前行。

（三）“具身智能”时代发展趋势的现实催化

202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涌现许多“热词”，如“具身智能”“量子科技”“6G”等具有时代感的词汇。这些新词汇代表了我国对新技术的拥抱，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新型技术支撑与方向指引。其中“具身智能”是“人类社会形式在数字技术发展的驱动下取得数字化形态的产物”^[14]，是指随着具身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体通过身体与环境交互来实现智能增长并深刻影响社会的各方面，这一未来发展趋势的开辟意味着一个以数字化生产和传播为标志的新型文化发展图景正在成为具象化的、可塑造的、可触碰的现实。对于繁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言，“具身智能”时代的到来为许多博物馆、展览馆开展借助数智技术为参观群众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的展示提供了技术支撑，有助于打造立体式云上博物馆与数字展览馆等文化便民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便捷化、可触化与实物化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化展现。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具身智能可通过动作捕捉、语音识别等技术，记录并还原传统技艺、民俗活动等细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更全面、准确的资

料，同时也可通过智能教育系统，将这些知识和技艺以具象化方式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华文化、喜爱中华文化与主动宣介中华文化。正是借助具身智能提供的新工具、新场景，人民群众能够更加主动便捷地参与文化创新与宣传。利用虚拟现实、智能交互设备等创造出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数字艺术作品，实现了在创新中赋予民族文化新活力与巩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因此，伴随着“具身智能”时代到来，将会催生出更加多样化的中华文化传播发展数字化样态与对外文化表达方式，助力中华文明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凸显其独特标识，从而强化民族文化自信，为巩固文化主体性铸牢坚实根基。

三、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实践进路

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新时代在利用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要秉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审慎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巩固文化主体、强化文化输出等方面着手，抓好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关键与重点，从根本上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全新的实践进路。

（一）巩固文化主体：融合需求导向与价值引领，迭代宣传方式方法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作为现代哲学范畴，赋予了主体观念全新的现代内涵：主体不是抽象封闭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主体”。^[15]数智技术迅猛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发展规划加速重塑的时期。数智技术使得人类社会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模式更具多样化与立体化，可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硬性技术支撑。

首先，坚定民族主体性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2]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蕴含着对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创造与传承主体的自

信与确证。数智时代，个体处于“虚拟—现实”世界相交织的“实体—虚体”角色叠加互置状态。数字空间是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展现与折射，数字个体本质上是“实体个人”的虚体化数字化表现形式。作为“实体个人”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迫切需要适应其发展的文化产品供给与价值领航，以期拓展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文化体验。因此，需积极推动数字与文化的“双向打通”，打造人民大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文化创作数字化表达样态，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心。

其次，落实人民主体性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与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化。坚持文化数字化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发展原则，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接受人民考验，秉持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基本原则。数智时代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需充分发挥数字媒体平台与智能技术的创新动能，通过数字化采集、虚拟修复与沉浸式体验等技术手段，推动优秀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延续文明脉络。同时，以数智技术赋能新兴媒体生态，聚焦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场景，建构内容创作与传播的新型范式。通过创新文化产品形态、优化传播路径，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品质”期待。为社会公众在文化共建共享中深化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提供切实保障。

不容忽视的是，确保政党主体性即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保证与最大优势。《“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提出“坚持和完善党领导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方面面，为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6]数智技术的迭代发展不断形塑中国共产党宣传宣讲方式。从过去“酒好不怕巷子深”到“最怕无人来问津”，是对当前传播生态的生动写照。如今数智技术不断重构着传

播格局，主流媒体的“报刊台网端”全媒体矩阵需深度融入数字传播生态，精准洞察智能传播规律，以主动革新姿态拥抱变革。通过入驻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推荐等技术，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符合网络传播特性的“轻量化”“可视化”表达，以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实现理论传播的“破圈”。依托大数据分析把握“Z世代”认知特点，通过短视频、互动H5、虚拟主播等数智化媒介形态，在“云端对话”与“屏幕交互”中增强理论传播的亲合力与感染力，持续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以技术赋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效能提升，夯实文化主体性的传播根基。

（二）活化文化IP：深融数字技术与古今文化，赋能中华文化IP生态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19]现代文化主体性的塑造与巩固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弛有度的借鉴、吸收与运用。数智时代在推进中华文明建设与巩固文化主体性中，需把握好数字技术与“两个结合”融合运用的“矢”，方可准确射中古今文化之“的”，以期赋能中华文化IP生态建设。

一是通过挖掘数字多元表达方式，激活传统文化基因的活力。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元素与精神内核，通过数字建模、沉浸式交互体验等形式，将古籍文献、传统技艺、历史故事转化为可视化、可交互的中华文化IP。如统筹建立国家级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库，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与语义识别技术，对全国重点文博机构馆藏的12万件青铜器、8.5万卷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建档，以便形成系统化、分层性与串联式资源整合模式。当前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项目已完成186万件/套文物影像采集，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提炼出青铜器纹饰数据

库，形成包含32类传统纹样的智能识别系统，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9]。再者，利用数字技术开发跨模态文化基因解析线上平台，整合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学等6大学科知识图谱，建构包含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等“文物+N”维关联的文化要素矩阵。当前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建立的“数字敦煌”知识库，已实现492个洞窟的壁画元素智能标注，形成涵盖佛教艺术、丝绸之路等主题的语义网络。通过数智技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厚重积淀。

二是重视建构古今桥梁，契合当代社会主体价值需求。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需以“两个结合”为指引并借助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等技术，精准对接当代社会价值需求，以期推动传统文化IP与现代生活场景、时代精神深度融合。首先可利用数据技术，建构起文化需求智能感知系统，依托微博、抖音等平台20亿条文化类UGC内容，运用LDA主题模型挖掘出“国潮服饰”“非遗美食”等12个热点话题集群。河南台借力诸如AR、VR、MR等媒体新技术与对于社会热点的精准把握，赢得大批海内外民众喜爱。据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河南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18期全网浏览量超过800亿次，70余家驻外使领馆和机构通过社交媒体向全球推介，实现了流量与口碑的双丰收。同时在有效挖掘我国古今文化资源转化为适合当代社会所接纳的表达方式的同时，也需关注多平台联动宣推，开发文化IP动态培育机制。苏州丝绸博物馆联合拼多多搭建“非遗云工坊”，通过直播数据实时分析消费者偏好，实现苏绣纹样72小时快速迭代，当前该模式使非遗产品复购率提升至38%，90后消费者占比达65%。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智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表达是强化文化主体性认同的时髦范式。

三是完善中华文化IP生态体系，实现官方与民间协同发力。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13]通过搭建数字化文化IP孵化平台，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等多方资源，形成“技术研发—内容创作—传播推广”的全链条文化生态。当前杭州国家动漫基地通过该类平台建构已实现IP开发周期缩短40%，版权交易效率提升60%。民间文化群体对中华文化创新传承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国相关县区政府可筛选具有产业潜力的民间文化艺术项目作为核心IP，创新传播方式，通过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发布相关项目资讯、图片、视频等增加曝光度，吸引更大范围的人群关注，促进民间文化艺术从“地方记忆”升华为“全球语言”，建构起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范式，从而使文化传承人在传播地方文化中潜移默化地提升文化自信心与宣传文化主动性。

（三）强化文化输出：联动智慧教育与智能技术，丰富文化生产能力

数智时代不仅需要中华民族自身对于文化数字化与虚拟化形塑，更需要实物化与虚拟化的文化产品载体，以世界人民可视听化的方式实现文化输出的有效化。依托产品数智赋能下的文化产业，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孪生体等技术的应用，将不同产业的企业、机构、设备、产品等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整合、优化^[17]，更是挖掘我国文化生产能力的可行探索。因此，应该深度联动智慧教育与智能技术，系统性提升文化生产能力。

一是智慧教育在文化传播与输出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依托在线教育平台、智能学习终端等载体，建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教育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际教育课程。通过互动

式教学、虚拟课堂等形式,开发数字化文化教育资源库并运用智能翻译技术打破语言障碍,让全球学习者便捷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此外,借助智慧教育平台培养专业的文化传播人才,“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18],提升其运用数智技术进行文化创作与传播的能力,进而推动巩固文化主体性工作全方位落地。

二是智能技术为文化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可能。打造“数智技术+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是数智时代推进中华文化蓬勃发展的必行之举。借助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数字化采集、整理与创新表达,以实现对中国文明数字化转换与资源长存。同时可利用AI图像生成技术,将传统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数字化再创作,让人民大众感受到“看得到但看不懂”的文化遗产通俗易懂式表达,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民族归属感与文化自信。同时,借助智能技术分析全球不同区域受众消费倾向,提升我国文化海外输出能力。针对北美市场,通过分析TikTok、Instagram等平台逾2.3亿条文化消费数据,发现用户对“科技+传统”融合形态的接受度更高。故可将中华文化中的经典形象,重构为具有美式街头文化特征的数字藏品与文创产品。以实体为承载,以“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9]为目标,推动中华文化衍生产品走出去。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20]中华文明是解锁中国之谜、领悟中国式现代化精髓的关键所在,亦是

驱动中国融入世界舞台、引领全球发展潮流的重要齿轮。在数字技术重塑全球文化格局下,深度挖掘中华文化在智能时代的发展潜能,系统建构契合时代需求的数智化传承创新体系,既是顺应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必然选择,也是筑牢文化主体性根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路径。这一实践不仅关乎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型,更旨在通过技术赋能强化中华文化在全球数字生态中的自主性与话语权,确保民族文化基因在数字浪潮中保持独特性与生命力,为文明传承与创新注入持久动能。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有效途径,其旨在以文化为杠杆激发各国间交流互鉴活力与需求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中华文明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以期促进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共同谱写人类文明发展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2]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2024-10-29(01).
-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2).
- [4] 卓悦.浅析儒家思想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汉字文化,2023(18):43-45.
-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 [7] 王经绂.“数智”赋能下文化产业的现代化生产:逻辑重构与范式变革[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2):116-125.

- [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161.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613.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67.
-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536.
-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N]. 人民日报, 2023-02-28(01).
- [14] 刘亚品. 数字空间:互联网社会的现实建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10): 103-108.
- [15] 郭晶. “主体性”的当代合理性: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46.
- [16] 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N]. 人民日报, 2022-08-17(01).
- [17] 陈春春. 产业互联网的定义和分类[J]. 互联网经济, 2018(Z2): 32-35.
- [1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01).
- [1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党建, 2022(11): 4-28.
- [20]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 求是, 2025(08): 4-8.

责任编辑: 陈琴容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健全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

陈盛兰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唯物史观,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创造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逻辑”在社会治理领域建构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根本制度, 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等新时代要求。对此, 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可从“提升党政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效能”的共建层面、“以市域治理层级为枢纽推进‘五治融合’”的共治层面、“在维护社会公正基础上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共享层面探索制度创新。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D267;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81-0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原创性科学概念提出。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方面, 社会治理同样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时代要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样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在贯彻中国式现代化普遍

性要求基础上塑造社会治理的本土化制度体系与基本样态。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

现代化起源于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 通常是指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多方位历史转变过程, 强调“去传统化”, 指向“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状态”。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政治为基本特征的西方现代化一度被视作现代化的本质与唯一表达形式, 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救亡图存”“振兴自强”的初始路径。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盛兰,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治理。

“西化”探索接连受挫，现代化开始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探索在地化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现代化带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政权与制度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现代化”战略布局到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小康”量化标准，再到新时代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向“全面现代化”拓展，开启了现代化理论范式的重大变革。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在汲取中华文明关于“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等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坚守并贯彻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唯物史观，试图以“人的逻辑”破除西方现代化“资本的逻辑”桎梏，以价值理性中和工具理性，以“共同体”协调“主体—客体”对立，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致力于搭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2]。

（二）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强调以“人的逻辑”替代西方现代化理论“资本的逻辑”，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经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人的逻辑”与社会治理“对人的服务”本质属性的逐步贴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人’，而其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表现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明确了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3]，以“价值理性”“人的全面发展”“主体间性”“共同体”等核心要素建构出共享发展、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导向的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描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内涵，呈现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基本结构。一是“党政引领、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一方面，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为轴心，“在社会在哪、公众在哪尚未明晰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确切的责任者”^[4]；另一方面，社会治理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党建引领为抓手，以政府制度建设为支撑，不断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建，在集中资源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五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了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方式，它们与政治、德治有机联动，构成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先导、自治强基、智治支撑为内涵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三是“纵横贯穿、双向互动”的精细化社会治理路径。一方面，社会治理依托各个治理层级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与制度搭建；另一方面，市域及以上治理层级“自下而上”的选择性吸纳基层社会可复制性做法进行制度化改造与区域推广，例如在推广“枫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时代“枫桥经验”。四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按照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说法，“实质意义上的‘共同体’只存在于传统尚未解体的村落等‘小社会’中，而且日益枯萎，甚至日益消亡”^[5]。但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韦伯所说的“有机连结”，就必然会产生公共利益，多方主体间的协同联动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萌发公共精神，从而塑造以公共利益为触发点的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性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造就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特殊形态，无论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

方式，还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逻辑均贯穿始终。

（一）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制度层面体现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并在社会治理领域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享发展指向社会领域公平正义，强调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社会治理领域首次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并将其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领域的根本性制度。何为“共建共治共享”？其直指社会治理的主体、方式以及目标，“共建指向社会治理主体，强调‘社会由谁治理’，指向‘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共治指向社会治理方式，强调‘社会怎么治理’，指向‘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共享指向社会治理目标，强调‘社会治理为了什么’，指向‘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层面建立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6] 共建共治共享试图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纵向打造市域—县（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善治指挥链，横向构建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治同心圆，达成“多元主体间权责明晰的制度化合作”，为迈向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作出时代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广泛践行于镇域、县域、市域、省域等各大社会治理层级，现存共建主体不足、共治方式滞后、共享目标弱化等普遍性问题，在不同治理层级又呈现出差异化特点：在镇域层面，基层工作人员行政任务繁重，无暇顾及群众工作，群众自治弱化是核心问题；在县域层面，条块分割、权责不对等、压力型体制促使基层社会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市域层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善治指挥链搭建受阻；在省域、国家层面，共建

共治共享制度的落实亟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需求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根本制度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下对基层治理实践困境作出回应。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逻辑”理解社会，它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对“个体化”的执着，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搭建，在共建共治共享中重塑集体本位下的现代化社会关系。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建共治共享制度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具体。

1.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地化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人口规模巨大，带领14亿人口共同走向现代化，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可想而知，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特征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变得尤其重要，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治理领域，如何为“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的大规模群体提供理想的公共服务、有效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保障公共安全极度考验执政党对社情民意的在地化考量，在社会力量不发达、公众公共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的过渡阶段，执政党必须担负起统筹协调多方共建的责任，“它既依靠‘以党领政’的政治结构，推动组织整合；也凭借价值理念的更新再造，推动意识形态话语的延续与创新；还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实现民意吸纳和社会动员”^[7]。这是中国式社会治理区别于西方社会治理的典型特征，也是共建共治共享制度创新中最具演绎空间的部分。

2.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强调“全民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立场最直观的目标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基础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享发展是共同富裕在新时代的阶段性表达，指向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社会治理领域强调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间实现“全民共建共享”，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全面覆盖，无论弱势还是强势、贫穷还是富有均应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社会矛盾问题化解的权利；另一方面，共建才能共享，无论哪类群体，均可通过利益诉求表达、民主协商、资源互助共享、志愿服务供给等方式参与社会共建。

3.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全面共享”。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突破社会主义现代化早期阶段对物质层面“四个现代化”的单一追求，强调五位一体全领域的现代化，覆盖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尤其是生态领域现代化主动打破主体一客体对立的“人类中心论”，以主体间性的平等视角去重塑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在社会领域，全方位的现代化意味着推动人民群众实现全面共享，在物质层面共享经济领域发展成果、良好的公共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的制度体系、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在精神层面共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提升社会治理的德治效能。

三、新时代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制度体系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党政引领在地化治理、全民共建共享、全面共享等新时代要求，它们与共建共治共享在各个治理层级的实践困境相结合勾勒出新时代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制度体系的创新路径。

（一）共建层面：提升党政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效能

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便是确立以党政引领为核心的多

元共建体制，故再度审视“党委领导”核心作用有助于提升党政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效能。

1. 增强党建引领的“空间塑造”能力。党建引领具有极强的空间塑造能力，不仅能够打破政府内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桎梏，而且能够以基层党组织为抓手突破多元主体间的群体性区隔来营造共建空间：从纵向看，党建引领继续延展基层党组织网络经度，搭建从街道党工委到党员中心户的组织架构；从横向看，进一步拓展基层党建网络纬度，夯实“党建+”功能，以党建加物业公司、新就业群体、非公企业等社会力量的方式为化解重难点社会矛盾问题寻求抓手；从全方位看，对于网格化管理、市域社会治理等系统性难题，地方党委可委派地方主官组建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统筹搭建区域纵横向职能部门联动协调的互动空间。对于党委、政府、社会力量、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乏力问题，党建引领可利用基层党组织网络抓手开展联席会议，串联多方力量针对社会矛盾问题化解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开展圆桌会谈。

2. 强化党委领导的政治引领功能。党建引领最擅长的就是以各级党组织为单位通过专业化思想教育活动和规范化的政治学习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培训。具体来看，党委主要通过“党员下沉”“话语形态转换”等方式来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其一，做实“党员下沉”。鼓励党员干部参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此为途径嵌入基层社会并落实其规定责任，推动下沉党员在入户访谈中调研居民真实诉求并支持其调动组织关系为基层社会提供补充型公共服务。其二，推进党建活动精细化。仪式化、政治化的党建活动有助于激发党员领导干部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行政工作中的“效率”逻辑向“服务”逻辑转变。因此，在做实群众需求调研的基础上，以下沉帮扶、话剧演绎、党课培训、设置“供需匹配”的志愿服务等新路径不断提升党建活动的精细度与精准度。

3. 增强党建引领的社会动员能力。除了整顿政府内部秩序、规训政府主体“不忘初心”外，党建引领还应具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资源践行群众路线的基础。党建引领试图通过织密基层党组织网络—以基层党组织网络为基点链接资源—开展社会化党建活动的模式运行社会动员机制。当前党建引领的社会动员功能面临基层党组织多而不强、多方资源链接机制不健全、党建活动社会性不足等现实问题，对此，党建引领应进一步建强社会力量相关基层党组织堡垒、加强对社区服务类、应急管理类等紧缺社会组织的培育、引导健全多元主体资源共享激励机制、主动设置专门针对辖区居民需求的社会化党建活动来增强多元主体与社区的粘合力。

（二）共治层面：以市域治理层级为枢纽健全“五治融合”机制

共治指向社会治理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全民全面共同富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全领域的共同富裕意味着社会治理方式同样需要迈向全面化，无论是社会治理层级，还是社会治理方式都在经历一个先分化再全面融合的过程。

1. 在治理层级上，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枢纽功能。县域和市域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同治理层级，市域层级位于上承省域下启县域的枢纽位置，强调发挥市级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基层治理的前线指挥部，而基层治理的重心依旧在县域，县（区）的组织实施与乡镇（街道）的执行落实同样重要。在基层实践过程中，条块分割、“小马拉大车”、压力型体制、外部支持不足等因素促使县域社会治理陷入“有创新低效率”的内卷化困境，而市域层级恰是解除县域社会治理困境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枢纽功能可推动省—市—县—乡镇治理层级实现纵向联动融合。但在实际试点工作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涉及多级政府行政体制内部纵横向结构性

改革，短期内整体性改革难度巨大，多数城市遇挫而放缓整体性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工作，转而走向“渐进性”“局部性”的市域社会治理改造，凸显市域社会治理的前线指挥功能，以县域治理平台搭建、基层减负赋权、加强基层社会外部支持为突破口，为基层治理腾出些许创新空间。

2. 在治理方式上，健全“五治融合”机制。首要举措就是厘清“五治”内在关联性。“五治”顺应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运行规律，在德治高线和法治底线间的合理空间内，以智治为手段，探索政府管理和群众自治的最佳契合点。其次，以基层治理平台为载体集成“五治”资源，相比于改革阻力较大的市域社会治理规范化平台建设，以规范化建设的县域综治中心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平台搭建更具可操作性。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建立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2]，基层治理平台为系统性运行“五治融合”机制提供理想场域：以“政治引领”提升网格化管理的层级联动、部门协同效能，加强社会矛盾问题化解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自治”串联人民调解组织、热心群众、志愿服务组织提供矛盾调解服务；以“德治”供给心理疏导服务、培育公共精神；以“法治”吸纳律师、法官提供法律咨询、诉前调解服务；以“智治”提升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的数据收集、分析、应用水平，增强基层问题发现、矛盾分析、风险预警能力。

（三）共享层面：落实全体人民共建共享权责，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共享指向社会治理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强调全民全面共同富裕，内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关联于社会治理领域，即在社会矛盾问题化解、公共安全保障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社会治理关键领域，全体人民平等拥有共建共享的责任和权利。

1. 落实全体人民共建共享权责，维护社会公平。共享的首要条件在于确保社会公平，全体人民公平享有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成果的权利。首先，落实全体人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共建权责，厘清共建共享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重点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维护全体人民在基层民主中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协商权等法定共建权利；另一方面，强调全体人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共建责任，共建才能共享，建立共建与共享转化机制，参与供给志愿性、自治性服务的群众理应优先享有更多公共服务；其次，保障全体人民合理共享公共服务的权利。“差异的绝对性决定了社会公平的相对性”^[8]，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发达的前提下，政府需要针对不同群体分类供给差异化公共服务：对于全体人民，坚决维护全体人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对于弱势群体，在确保其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扩展至系统性公共服务供给；对于关键群体，强调针对性公共服务的补充性供给。

2.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全民全面共享。新时代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强调服务对象的全覆盖，而且强调服务内容的精细化、全面化以及服务主体的多样化。首先，增加嵌入式服务数量，规范化供给与群众需求相嵌合的普惠性服务，“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支持养老、托育、家政、助餐、助残等普惠社会服务进社区”^[9]；其次，提升公共服务的全面性，不仅要提供“养老托育、社区助餐、家政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等物质层面的公共服务，还要供给精神层面的公共服务，“加强家庭教育社区支持，建设群众可感可及的社区公共文化空间”^[9]，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后，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并非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实现公共服务全面化精细化供给亟需党委领导下多元主体参与共建：政府负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尤其

擅长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力量可通过“五社联动”、慈善、公益创投、非营利、志愿服务等方式协同供给社区服务类、环保类、应急类、文体类、维权类等补充性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3-14.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16) [2022-10-25]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3] 张文显.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J]. 法商研究, 2020(2): 3-17
- [4] 成伯清. 市域社会治理: 取向与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11): 10-16.
- [5]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33.
- [6] 陈盛兰. 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2(1): 128-136.
- [7] 张紧跟. 论使命型政党的治理机制[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2-8.
- [8] 易小明, 刘庆海. 差异与社会公平[J]. 社会学, 1994(11): 19-22.
- [9]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EB/OL]. (2025-03-02) [2025-06-09]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6/content_7027015.htm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6/content_7027015.htm.

责任编辑：陈琴容

青年生育观转型背景下 “放开生育数量” 人口政策之提倡

杨帆 吴筱岑

(扬州大学 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治理的核心议题, 其实效关涉国家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 青年生育观发生剧烈变化, 传统生育观“性—爱情—婚姻—生育”四位一体的捆绑关系逐步分离, “两头婚”“非婚生育”“丁克家庭”等“新型合意式生育”兴起。虽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 但三孩政策难以显著激励低生育意愿群体, 同时限定了具有较高意愿生育群体生育子女的数量。从长远谋划, 为了确保我国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 我国应基于青年生育观嬗变的多维作用机制, 以系统思维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除了出台一系列生育支持辅助政策之外, 实施完全放开的生育政策。

关键词: 生育观; 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 生育友好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4-087-09

我国关于人口控制的政策难以适应现代化的步伐, 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 年总和生育率降至 1.3 历史低位,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约 13.5%。^[1] 少子化与老龄化交织形成的人口问题亟待从生育政策层面予以回应。人口转型的困境折射出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微妙关系: 短短几十年间, 我国青年的生育意愿发生巨大转变, 计划生育的政策导向也相应出现扭转, 从允许生育一个子女转向鼓励生育多个子女。当代青年对生育的认识逐步从责任观转向权利观, 制度化生育观也日渐受到“两头婚”“非婚生育”“丁克家庭”等新型生育观的冲

击, 而现有生育政策仍以传统生育观作为预设, 与当代青年的新型生育需求不相适应。着眼于制度史与系统论的纵深视角, 本文尝试阐明制度化生育观所面临的现代性冲击, 凸显我国实施完全放开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以此缓解生育决策的惯性与现代性需求之间的内生矛盾。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之维

(一) 我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

1. 自发生育决策时期(1949—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我国社会在经历了长期战乱的动荡不安之后正值百废待兴之际, 国家此时秉承着“人多是好事”的人口政策立场, 将人

作者简介: 杨帆, 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学、人口学。

吴筱岑, 扬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社会学、人口学。

口视为恢复生产与增强国力的人力保障，民众在生育环境趋于稳定的情势下也继续践行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观念，鉴于人们的生育意愿与国家对人口的需求不谋而合，国家并未对生育行为进行干预，而是由民众自主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此外，当时苏联鼓励生育的人口理论和政策对我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国内外形势的叠加影响下，我国人口数量在此阶段迅速增长，为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

2. 倡导节制生育时期（1955—1977年）

人口现象是长周期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社会的稳定使公众的生育意愿显著提升，并且伴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逐步提高，人口死亡率大幅降低，因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彼时，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与有计划发展的国民经济之间出现了矛盾，社会各界对节制生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家先后发出提倡节制生育的号召。1955年3月，在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首次从政策层面提出要适当地节制生育，但未对生育子女的数量作出明确规定。1962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倡导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节制生育。此后，又相继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以及“晚、稀、少”等政策，反映了国家当时控制人口数量的紧迫需求，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式出台奠定了前期基础。

3. 严格收紧生育时期（1978—2001年）

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从根本法层面明确了国家在人口控制方面的责任，同时也强调了公民履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义务。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中提出了“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口号，提倡一对夫妻生

育一个孩子，成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历史节点。随后，在农村一孩政策执行陷入困境的情况下，1984年的中央七号文件提出在农村地区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政策。1990年，在人口快速增长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压力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重申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立场，以此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将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了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此阶段，计划生育政策“运动式”地贯彻执行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独生子女政策也为后续生育意愿降低等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4. 逐步放开生育阶段（2002年至今）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与适龄劳动力的减少，我国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举措，逐步突破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严格要求，先后于2002年、2013年、2015年出台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政策措施。2021年，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制度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迈入逐步放开的历史新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从严格控制生育到鼓励支持生育，其演变历程体现了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灵活调整人口政策的智慧。时至当下，三孩政策实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生育作为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行为受制于生育成本、性别平权、生育观念等多维动力机制，而三孩政策对于“不想生、不愿多生”等生育意愿较低的群体并无实质性的激励效应，其受众群体集中于生育意愿较高的群体，但三孩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又无益于高生育意愿群体“想要多生”的生育动机。有鉴于此，我国及时实施完全放开的生育政策在青年生育观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必要。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

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调控机制，习近平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全

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生育政策历经“鼓励生育—计划控制—适度宽松”的变迁历史,但始终与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相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稳固新生政权、恢复生产、补充劳动力,鼓励生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随着“马尔萨斯陷阱”的隐现,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旨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3]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减缓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4]据估算,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30年间,我国控制了约4.58亿人口的增长。^[5]诚如时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断言,计划生育政策成就巨大,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6]如果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的中国人口可能达到17亿至18亿,人均资源将严重不足,环境难以承载发展的需要,经济也无法达到现有水平。

我国生育政策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在工业化初期,通过人口扩张积累“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供给充足的劳动力储备;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使年均GDP增长贡献率开始上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着力破解少子化和老龄化困局,更注重家庭伦理的重建与传承。此外,我国还积极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助推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形成。^[7]

(三) 生育政策滞后于时代变迁的现状

有学者断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负面影响,对未来的人口发展、经济形势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带来了隐性难题。^[8]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明显。本世纪初,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0~14岁人口比重为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9]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占比不断增加,2023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1.1%,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少儿人口占比仅为16.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有学者预测,至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导致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也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沉重负担。^[11]

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时期,“4—2—1”家庭结构(即一对夫妻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子女)使年轻一代面临巨大的赡养和抚养压力,而独生子女普遍存在“421综合症”(或称“独生子女溺爱综合症”)的过度依赖原生家庭的心理,因而生育意愿在独生子女群体中显著下降。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家庭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导致男女性别比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向,性别比例已从1980年的107.3攀升至1997年的120.14。^[12]性别比例的失调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大量难以婚配的男性成为“光棍”群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适龄男性的婚配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如此,由于农村地区的家庭规模缩小,已婚或未婚的年轻劳动力不得不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留守儿童以及空巢老人群体涌现出来。同样,城乡人口流动的不均衡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沿海发达地区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而中西部地区则因人口流失陷入经济发展困境。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40余年间,其政策影响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生育观念中。虽然我国已经渐进地实施放开生育的政策,但当代青年对于生育的态度已发生巨变。年轻人面临着高昂的抚养成本、职业发展压力以及激烈的教育竞争等因素,许多家庭“生不起”“养不起”,人们的生育观念逐渐从“多子多福”转向“少生优生”甚至“不生”,

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历史变迁：2001年在立法之初规定了“国家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2015年修正之后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21年则修改为现行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可见，我国的计划生育对生育子女的数量要求逐渐宽松，但是还并未实施完全放开的生育政策。

二、完全放开生育的现实之需

（一）传统生育观日渐衰微

生育观念是民众在国家 and 民族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对生育行为的根本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育观念长期以组建新生家庭为核心，强调性、爱情、婚姻和生育之间的捆绑关系，传宗接代被视为适龄男性青年的重要使命，因此，生育决策不仅是凭借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更是一种制度化的家庭伦理与社会规范。

我国传统家庭观强调家族的延续和壮大，“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成为民众普遍认可的主流生育观。宗族制度要求男性子嗣必须生育男丁以延续香火，此种观念不仅体现在家庭内部，还通过社会舆论和文化规范得以强化。传统社会的经济模式也为此种主流生育观的稳固提供了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依赖使得生育更多的子女特别是男丁被视为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现代的婚姻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男女平等，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农村地区，生育观念仍然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意在通过控制人口增长实现社会的平稳发展。然而，政策的实施无法超脱于传统生育观念的文化土壤，民众对于生育行为的理解 and 实践仍然受到传统生育观念的深远影响。

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孕育了新的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在当代社会正经历剧烈震荡，其衰微是多

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基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性超过劳动力的数量，尤其是城市化的加速革新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传统的扩大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转变，许多年轻人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不生孩子，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再如过去那样紧密，当代青年的“断亲现象”便是典型例证。城市化给当代青年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方式，年轻人逐渐脱离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更加注重个体的发展与自我实现，人生观的嬗变使结婚和生育不再被视为人生的必然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推迟结婚和生育，甚至选择不婚不育。此外，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条件，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更多的女性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进而参与社会生活和职场竞争的能力增强，助推了女性权利意识的提升，因而女性不再将自己的人生价值限缩于家庭空间，而是更广泛地体现在职业发展和社会贡献上，选择不婚不育、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女性群体大幅增多。

后现代价值观也在重塑着生育的意义系统——当代青年逐渐意识到生育不再是家国层面为了香火延续与国家发展所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而只是个体能够凭借自由意志理性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一，因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个人幸福”超越“道德责任”成为生育的首要意义，无论是选择不婚不育还是崇尚多子多福都受到人们的尊重。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信息传播方式的便利使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当代青年日益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生育行为只有与之相匹配时才会成为当代青年的选择，而社交媒体将育儿异化为中产阶层的生活景观，“鸡娃”“海淀妈妈”等社会现象也营造出育儿焦虑的生育氛围，年轻一代更倾向以消费替代生育，我国青年的主流生育观正经历从“制度化、单一化”向“个人化、多元化”转变。

（二）新型生育观成为风尚

在传统社会中，生育行为通常嵌套于婚姻制度之中，婚姻不仅是两性结合的纽带，更是社会规制生育行为进行的核心机制。然而，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叠加生育压力，使传统的制度化生育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性、爱情、婚姻、生育四者的关系逐步割裂，一种强调个人选择、尊重个体自由的新型生育观逐渐成为社会风尚，置身于对生育持有宽松态度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的生育观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13]新型生育观的核心表征在于生育不再与婚姻制度严格绑定，而是逐步外化为个体之间的合意。新型生育观主要包括两种亚类型：“新型合意式生育”和“不婚主义”——前者包括“两头婚”“非婚生育”“丁克家庭”等多元化形式，是具有结婚或生育意愿的个体对传统生育模式的改造；而后者则体现了外部生育环境将青年的生育意愿挤压至低位之后，部分青年选择完全不进入婚姻与生育体系之中。因此，根据生育意愿的不同，可以将青年群体划分为高生育意愿群体、中生育意愿群体和低生育意愿群体，这三类群体在面对国家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环境和个人价值观时，展现出不同的生育决策偏好。

高生育意愿群体仍然崇尚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认为生育子女不仅是家庭兴旺的标志，也是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例如，在广东潮汕地区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大家庭模式仍占主导地位。潮汕地区是中国宗社制度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家族观念和宗族活动极为发达，每年春节潮汕地区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传统活动，宗族凝聚力可见一斑。此外，瑶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文化提倡早婚、早育、多育，认为子女众多可以提供劳动力保障与养老保障，也有利于本民族文脉的赓续。有学者认为，与汉族地区相比，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较慢，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也相对滞后，生育行为依旧被视为一种基于本能的惯性决

策，而非需要严格规划的家庭决策。^[14]高生育意愿群体秉承“多子多福”的个体认知，祠堂文化、祖先崇拜构成生育行为的意义系统。尽管国家已放开三孩政策，但对于具有较高生育意愿的群体，三孩可能也无法满足其对于生育的需求。在政策层面，部分自治地区的生育政策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宽松，部分省市对超生的处罚力度减弱，例如降低社会抚养费标准，或在特定情况下不予追缴。一些家庭可能通过隐瞒超生事实、跨区域生育、境外生育等方式规避政策，随着落户政策放宽，一些超生子女可通过“落地补登记”方式获得户口，进一步降低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力。

中生育意愿群体指那些具有生育意愿但出于经济成本、社会保障、育儿压力或国家生育政策等因素考虑，不愿多生或仅生育少数子女的群体。中生育意愿群体的生育观受现实生育成本的影响较大，其生育意愿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挤压。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和高育儿支出使得许多青年不得不谨慎考虑生育问题，在当代青年的认知中“生孩子不再是多双筷子的事”，育儿不仅仅是抚养孩子长大，还涉及教育投资、医疗投入、住房成本等系统性问题。对于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言，生育一个孩子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他们往往选择减少生育数量，甚至推迟生育。生育、养育、教育——“三育成本”的升高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当代青年的婚育意愿，育儿成本的高昂使许多家庭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犹豫不决。虽然国家已经实施三孩政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政策的放宽并未大幅提升生育率。部分地区仍然缺乏足够的配套支持，如育儿假、托育服务、教育公平等难题导致部分青年即便有生育意愿也会因政策支持不足而降低生育子女的数量。面对一系列生育成本的现实困境，部分青年群体不得不对传统的生育模式进行调适，“新型合意式生育”便是其中的典型体现，“两头婚”“非婚生育”在这些群体中成为新风尚。

低生育意愿群体是指那些不愿踏足传统婚姻和生育体系的群体，相较于中生育意愿群体对传统生育模式的调适，他们的生育观受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更深。在个人主义崛起的时代，越来越多的青年强调个体自由、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婚姻和生育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束缚，而非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路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单身生活方式更加便捷，独居、养宠物、旅游等成为替代婚姻和生育价值体系的新方式。除了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外，低生育意愿群体的形成也与我国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90后”群体大多数成长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于多子女家庭成长的个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习惯了独立的生活模式，更倾向于独居生活，而非被家庭责任捆绑。成长环境使独生子女对婚姻和生育缺乏依赖性，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生育意愿。尽管实施完全放开的生育政策对激励独生子女群体生育意愿的直接作用有限，甚至关联性短期内并不明显，但从长远来看，放开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低生育意愿在代际间的持续传递。

（三）生育观转型引发的人口问题思考

面对复杂的人口形势和多元的生育观，我国需要建立更加精准、包容、富有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对于高生育意愿群体来说，有必要实施完全放开的生育政策，使个体能够根据自身意愿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低生育率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在潮汕等传统生育文化区，家庭生育需求与政策限制形成矛盾。2021年三孩政策实施后，广东揭阳农村仍有不少家庭因生育四胎面临社会抚养费征收。在部分地区，尽管生育政策已经放开，但由于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多子女家庭仍面临较为严峻的生育困境。

对于中、低生育意愿的群体，则要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入手，出台强有力的生育支持政策以此达到减少生育负担、提升生育保障的目的。高昂的生育成本是中生育意愿群体生育动力受阻的重要

原因，我国应通过提供育儿补贴、减免托育服务费用、增加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供给等多种方式降低生育成本。对于低生育意愿群体，政策制定者应充分理解并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因为简单机械地通过政策途径难以激发他们的生育意愿。相反，国家应当通过多样化的社会支持体系帮助这一群体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并为其提供完善的养老支持体系。

三、我国生育政策的时代回应

（一）系统论视阈下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的化解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以系统论方法为指引，明确生育政策之外的众多因素也对人口问题产生影响。以往的生育政策多以控制生育数量为核心内容，但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仅靠调整生育数量限制已不足以扭转生育意愿下降的态势。系统论强调整体性、动态性和互动性，为理解生育政策的复杂性提供了理论框架，生育政策不仅是人口治理的一部分，更是婚姻、家庭、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多元子系统协同运作的复杂适应结果。因此，生育政策的优化应当结合青年生育观的转型，回应青年群体对婚姻与生育体系的现实关切，并推动法律制度适应性调整，以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和稳定的生育支持体系。

生育观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受文化传统、经济条件、性别观念、婚姻家庭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从系统论角度来看，生育观的变迁并非单一变量的作用，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个体主义、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同时高昂的养育和教育成本、职场性别歧视、住房压力等因素导致育龄群体尤其是女性推迟甚至放弃生育。此外，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使个体对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依赖减弱，削弱了“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家庭规模缩小、婚姻观念变化、离婚率上升等趋势，使得传统以婚姻为前提的生育模式受到挑战，部分青年对婚姻缺乏信心，恐婚恐育心理加剧。^[15]与此同时，“两头婚”“非婚生育”“丁

克家庭”等“新型合意式生育”模式逐渐出现，反映了生育观念日趋多元。然而，现行法律和社会政策仍主要围绕传统婚姻家庭结构进行设计，未能充分保障这些新型家庭模式的权益。

法律制度对生育作出了多维度的规定，既涉及与生育直接相关的内容（比如婚姻家庭、生育奖励、育儿假制度等），也囊括了就业、社会保障等间接与生育有关的内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需以法律革新为基础，建立全周期的制度支持体系。近年来，离婚冷静期、家暴治理难、夫妻共同财产认定难等议题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加剧了青年群体特别是女性青年群体恐婚恐育的心理。优化婚姻法律制度，应当在保障个人自由与维护婚姻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其一，针对离婚冷静期制度，可进一步细化适用范围，如对因家暴、重大背信行为等情形提出更具人性化的豁免规则，以减少制度对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其二，家庭暴力问题严重影响女性的婚姻安全感和生育意愿，现行法律在家暴取证、庇护救助、法律援助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应强化反家暴法的执行力度，健全预警和干预机制，同时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全面的法律与社会支持，减少女性因安全顾虑而拒绝进入婚姻和生育的可能性。其三，传统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在财产归属和分割上对全职育儿或因生育中断职业发展的女性存在一定的不公，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规则未能充分补偿女性隐形的生育成本，因此亟待离婚财产分割制度中引入育儿贡献评估机制。与此同时，新型生育模式的制度保障缺位凸显法律滞后性——“两头婚”的财产分配与抚养责任缺乏规范指引，非婚生育子女在户籍、福利获取中遭遇系统性歧视，这要求法律体系突破传统“核心家庭”预设，通过明确新型婚姻模式权利义务、剥离生育权益与婚姻状态绑定等改革，构建包容多元生育形态的制度框架。

（二）作为辅助的生育支持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 18 条的变迁体现了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经历了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导向转变。2001 年该法立法之初规定“国家鼓励晚生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初步建立了生育支持框架。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不久后，法律规定国家对独生子女家庭提供奖励和社会保障，首次明确“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其本质是生育控制的经济补偿机制，但奖励的标准偏低且未随生活成本的提升及时调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动，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5 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正，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即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并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给予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2021 年，面对出生率持续走低趋势，国家再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新法强调，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从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例如，完善生育休假制度，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假、生育奖励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假期落实到位，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指导地方做好政策衔接，积极稳妥抓好落实，旨在从多方面降低生育成本，营造支持生育的社会环境。

虽然相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经济补贴和税收优惠，但相较于抚养子女所需的长期高额支出而言，这些补贴显得杯水车薪。托育服务的供给不足、公共托育机构数量有限、私立托育机构费用高昂，导致家庭在育儿方面面临巨大压力，特别是对于双职工家庭，缺乏可靠的托育保障使其生育意愿进一

步降低。^[16]对于生育意愿居中的群体,许多家庭对生育保持观望态度,“想生但不敢生”成为大多数人的主观状态。对于生育意愿较低的群体,现有政策难以显著提升其生育意愿,因为追求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仍然在这些青年的人生观中占据主导地位。相比承担育儿责任,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专注于事业、个人成长等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婚姻和生育不再是女性唯一社会价值的体现。然而,这种新兴的价值观仍不能被社会部分同性或异性群体所接受,“母职惩罚”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女性群体的境遇。^[17]虽然法律规定保障生育女性的就业权益,但在现实的职场中,女性因生育遭遇职场歧视、晋升受限等问题仍旧存在,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女性对生育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尽管生育支持政策依然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但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的调整,传递出鼓励生育的信号,有助于改变社会公众对生育的消极态度,营造支持生育的舆论环境。某些地区在落实国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推出了更具针对性的生育支持措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至少已经有25个省(区、市)在地方性法规中明确延长婚假。其中,山西、甘肃最长,可享受30天婚假,^[18]相关规定缓解了双职工家庭意愿结婚但缺乏可支配时间的压力。婚假的延长为新婚夫妇提供了更为充裕的时间来考虑生育计划,特别是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影响职业发展的年轻人来说,更长时间的婚假可以缓解他们的生育焦虑、增强生育意愿。

(三) 作为关键的放开生育政策

正如前文所述,为了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各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然而,即便在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的地区,现有政策的激励力度也相对有限,普遍存在补贴标准与实际养育成本严重不匹配、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等问题。比如,住房支持的力度不足且大多数政策仅针对高层次人才,对于普通家庭

并无实质性支持,难以充分调动青年群体生育的积极性。地方政策的制定以国家政策为依据,生育支持的力度在高生育意愿群体集中的省份无法突破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导致“想生但无法多生”的现象难以从地方层面得到有效解决。

如此看来,若想有效应对我国当下的人口问题,实施全面放开的生育政策能够直击问题要害。具体而言,应当取消对生育数量的限制,给予青年群体自主决定生育数量的权利,并满足多元生育观念群体的异质需求。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受限,本质是传统治理范式与人口现代化需求的脱节,唯有通过生育成本社会化、权利保障普惠化、文化重塑系统化的制度改革,才能突破“低生育陷阱”。未来,法律与制度的制定应当避免以“核心家庭—婚内生育”为预设,将政策红利覆盖至持有新型生育观念的群体。同时,地方还需要加大经济支持力度,在现有补贴基础上,提供更高额度的生育和育儿补贴。对于女性群体而言,相关部门应完善职场支持措施,推行灵活工作制,保障女性在孕期和哺乳期的就业权益,减少职业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冲突,为女性创造更加有利的生育环境。

结语

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孩政策”“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渐进调整的历史轨迹深刻映射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再生产模式的结构矛盾。当代青年群体的生育观正经历从“制度化、单一化”到“个人化、多元化”嬗变,生育政策的调整不能仅停留于生育数量的放开,应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回归以个体生育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将生育政策置于婚姻、家庭、社会福利等更广泛的制度体系中统筹考量。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应作为人口治理的方向之一,辅以系统性的社会支持体系。单纯取消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并不必然提高生育率,国家需要通过优化托育体系、完善生育保障、促进男女平等分担育儿责任等方式,构建生育友好

型社会。在现代法治框架下,生育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应当兼顾社会发展需求与个体生育权利的尊重,以平衡国家人口治理目标与个人选择权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在新型生育观兴起的时我们也要谨防技术革命给生育秩序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虽然辅助生殖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主观意愿生育而客观不能的家庭打开了另一扇门,但其潜在的伦理风险和身体危害也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 [1] 宁吉喆.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J]. 中国统计, 2021(05):4-5.
- [2] 习近平对人口计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推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落实[J]. 中国卫生法制, 2016(04):2.
- [3] 陈功,张吴璠. 争鸣中前行: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J]. 人口与发展, 2016(04):65-69.
- [4] 翟振武.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J]. 求是, 2013(23):57-59.
- [5] 陶涛,杨凡.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J]. 人口研究, 2011(01):103-112.
- [6] 田延华.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关情况进行解读. 共产党员网. [EB/OL]. (2015-11-17) [2025-2-10]. <https://news.12371.cn/2015/11/17/ART11447701265043402.shtml>.
- [7] 张智勇,丁辉. 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计划生育政策变迁逻辑——评张维宏教授《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8(02):122-126.
- [8] 陈小军. 论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制约:基于文献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11):5-9+33.
- [9] 国家统计局. 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经济网. [EB/OL]. (2019-8-22) [2025-2-22].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908/22/t20190822_32985939.shtml.
- [10] 雷海潮.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EB/OL]. (2024-11-07) [2025-2-22]. <http://www.nhc.gov.cn/wjw/mtbd/202411/33d0b7fe9ea84261971ef0ec7e1d02ac.shtml>.
- [11] 代志新,杜鹏,董隽含. 中国老年抚养比再估计与人口老龄化趋势再审视[J]. 人口研究, 2023(03):94-107.
- [12] 胡昌明. 计划生育法律政策的负面影响[J]. 法律和社会科学, 2009(02):135-164.
- [13] 杨帆. 法社会学视域下当代青年“并家婚”现象对双系抚育的冲击[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02):22-29.
- [14] 杨菊华.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J]. 人口与经济, 2023(03):35-51.
- [15] 胡益顿. 深度解码:基于“知乎”文本挖掘的青年“恐育”叙事探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11):77-87.
- [16] 朱海龙,李平洋,黄仙红. 中国生育政策体系:思想基础、历史路径与体系重构[J]. 社会政策研究, 2024(03):89-99+134-135.
- [17] 庄渝霞. 母职惩罚理论及其对女性职业地位的解释——理论进展、路径后果及制度安排[J]. 国外社会科学, 2020(05):140-149.
- [18] 邓晓琦. 一地明确:婚假 15+3 天,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新华日报[EB/OL]. (2025-1-28) [2025-2-22]. <https://mp.weixin.qq.com/s/gS1oA-TvuvZGob4SrrLpSQ>.

责任编辑:陈琴容

《福州党校学报》2025 年征稿启事

《福州党校学报》是由中共福州市委主管、中共福州市委党校主办的社科类综合性期刊。2025 年本刊辟有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党的建设、治理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文化研究、党校教育研究、福州发展研究等栏目。2025 年本刊重点选题如下：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3. 习近平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州的孕育与实践研究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6.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7. 党的建设与群众路线研究
8. 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9.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研究
10. 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
11. 人工智能及其社会化应用研究
12. 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路径研究
13. 榕台两岸融合发展研究

欢迎广大读者、作者来稿，来稿要求如下：

1. 来稿内容包括：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作者简介。另附题名的英译。如属基金项目成果，应在篇首地脚标注项目名称和编号。
2. 题名应简明、具体、恰当，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摘要一般不超过 300 字；关键词选取 3-5 个能反映文章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
3. 作者简介主要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学位和研究方向。在论文末尾注明：单位详细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
4. 正文一般以 6000—13000 字为宜。
5. 参考文献按引文先后在文中标出序号，并与文后参考文献序号一致。
6.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本刊电子邮箱：fzdxxb@163.com。作者来稿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
7. 本刊有权对采用的稿件作适当编辑删改，作者若不同意删改请在稿件上注明。稿件自寄出或发送 2 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

《福州党校学报》编辑部

弘扬 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

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 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